

## 工業社會與戰爭

蔡政文

### 緒言

歐洲自從在18世紀中葉發生工業革命後，整個社會因遭到科技的衝擊，導致社會結構、文化與價值體系的變遷。舊社會秩序（Ancien Régime）的崩潰，使歐洲面臨嚴重的危機，但也呈現未來光明的展望。

面對變遷中的社會，許多19世紀的學者提出他們各種不同的看法。孔德（Auguste Comte）認為工業社會將取代舊社會秩序的「軍國社會」（Société militaire），使人類生活在永久和平中，因為戰爭將在工業社會中完全消弭（註一）。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則認為工業社會的都市化性質、崇尚物質生活及群眾文明的形態，將如同羅馬帝國末期一般，帶來內戰，西方社會將趨於沒落（註二）。而尼采（Frédéric Nietz-

---

1: Auguste Comte, System of Positive Polity, vol. III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73), pp. 44-64.

2: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trans. by Charles F.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62).

sche) 更預測廿世紀將是世界大戰的世紀(註三)。馬克斯(Karl Marx) 認為工業社會將造成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終將導致無產階級的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然後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過渡到共產主義第二階段的社會，在此社會中，世界將呈現永久和平，不再有戰爭存在(註四)。

近代社會學者大致上也如同19世紀的學者一般，有樂觀與悲觀的看法。例如西方匯合論者認為工業社會將使不同的社會體系趨向匯合，而建立永久和平，或至少是工業社會間的永久和平(註五)。但生態學派(écologie) 則主張工業社會所創造出來的唯物社會不但使人類的生存環境遭受污染，而且也不能實際滿足人類的精神、心理與生理需要，除非發展另一種文化外，人類將處於暴力與戰爭的情勢(註六)。

事實上，科技發展確實提高人類的物質生活，工業化的社會，由於生活程度的提高、社會結構的多元化，導致國內社會張力

---

3: Frédéric 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 Walter Kaufman ed., Basic Writings of Nietzsche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68), p. 321.

4: Raymond Aron,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et la guerre (Paris: Plon, 1959), pp. 11-13.

5: 有關匯合論的綜合研究，參蔡政文：現階段和解中的歐洲——論兩種不同社會體系的匯合與歐洲合眾國的建設取向，台北，三民書局，民國67年。  
宋向倫譯：環境的危機，台北，巨流出版社，民國63年，頁6—7。

6: Philippe Saint Marc, Progrès ou déclin de l'homme? (Paris: Stock, 1978), p. 95.



的減弱。但這僅限於國內層面，如觀察國際層面，則將發現工業化的結果，造成國力的迅速增強、人口激增、生產量大幅提高亟需海外市場等，再加上歷史使命感、角逐霸權的慾望、種族因素、國家主義等，也就使歐洲國家間經常發生戰爭，尤其廿世紀上半葉兩次世界大戰更否定了孔德的樂觀看法。

然而，人類自從進入核子時代後，核熱武器的毀滅力，使工業先進國家瞭解除了消弭戰爭爆發的可能原因外，別無他途可循，否則核子戰爭的爆發，將是人類的末日。這種科技進步的消極因素，却造成了積極的後果——和平，完全出乎孔德預料之外。另外，歐洲歷經一百多年戰爭的教訓，使各國發揮現實主義的精神，承認有共同文明淵源的社會應該和平共存，甚至可透過整合的過程來實現歐洲的政經統一。因此，具有世仇的德法兩國，首先握手言歡，繼而共同致力於歐洲統合運動。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的成立，使西歐各國不但不像昔日爭戰不休，反而進行各方面的合作，各國經濟欣欣向榮，雖難免偶因國家利益而發生爭執，然均透過協商的程序圓滿解決。這一切似乎又符合孔德的樂觀預言。

經過將近兩個世紀的歷史過程，到底工業社會是否如同孔德所預測的那麼樂觀？還是像史賓格勒所說的那麼悲觀？此一問題值得做一有系統的深入分析。如果工業社會真如孔德的預測能達到消弭戰爭的境界，則加速各國工業發展乃是人類應有的責任。先進國家應本人類休戚與共的精神，致力於協助各落後社會的工業發展，以維護人類的尊嚴與和平。反之，如果工業社會只帶來戰爭與暴力，則應如何才能改善工業社會的弊端，或另謀途徑求

取人類和平的建立。因此，經由理論與事實的相互印證，探討工業社會與戰爭的關係構成本文的主要目的，而各派學說是本文的主要研究架構。

本文第一部分將探討科技與戰爭關係的理論，第二部分將研討廿世紀的戰爭，第三部分則分析廿世紀下半葉和平的跡象。

### 一、科技與戰爭關係的理論

十九世紀的觀察家在研究當時的社會變遷時，均被工業社會發展的一些景象所震驚，他們發現工業社會有一些共同特徵，但因對各項特徵所著重程度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結論。大致上，他們認為工業社會有六項基本特徵（註七）：

- (1) 工業以勞務的科學化組織為基礎，同時生產結構化以便達到最大的收益。
- (2) 由於應用科技於勞務的組織，人類的財富急速增加。
- (3) 工業生產導致勞工聚集於工廠與市郊，因而產生廣大勞工群眾。
- (4) 勞工聚集於工作地區的現象，造成勞資對立。
- (5) 雖然由於科學化的勞務組織使財富激增，但生產過剩的危機也相對增加。一旦發生此種危機，不但不會增加財富，反而造成貧窮。在此情況下，雖有大多數的群眾陷於悲慘的境界，但却有許多產品無法售出。在精神上，19世紀的學者深以

---

7: Raymond Aron, Les étapes de pensée sociologique (Paris: Gallimard, 1967), p.88.

為恥。

- (6)自由經濟是經濟制度的特性：追求利潤、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等。有些理論家甚至認為增加財富的基本條件是追求利潤與競爭，所以主張國家越不干預經濟事務，財富也就越能迅速增加。

就因對上述各項特徵的着重點不同，而產生樂觀與悲觀的看法。如孔德強調前三項，而把勞資對立、生產過剩、自由經濟視為過渡時期的表象而已，這些都將隨工業社會的發展而消失，故他對工業社會的遠景充滿樂觀與信心。史賓格勒則把焦點擺在(3)、(4)、(6)的消極面，因此他認為機器文明、拜金主義、民主政治終將面臨凱撒主義的來到，「寶劍將勝過金錢」。而馬克斯把重點放在後三項，不過他對工業社會發生無產階級革命後，抱着無限的樂觀，亞隆稱之為「災難式的樂觀主義」(optimisme catastrophique)(註八)。

現代西方滙合論的觀念較接近孔德的樂觀看法，但生態學派與心理學派則較近史賓格勒的悲觀論點。不過，它們的論點並非以19世紀的工業社會為基礎，而是以先進工業國家的發展為起點，嘗試尋求工業社會或應稱為「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可能歷史發展。它們的見解將有助於對近代工業社會與戰爭間的關係，做一比較實際與深入的探討。

#### (一)悲觀主義者的論點

悲觀論的主要觀點是認為工業社會崇尚物質享受、追求進步

8: Raymond Aron,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et la guerre*, p.6.



與成長，忽略人類精神層面的發展，終將帶來暴力與戰爭，自尋毀滅。不過19世紀與當代悲觀論，出發點不一致。

### (I) 史賓格勒的悲觀論

在「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書中，史賓格勒對西方工業文明的發展充滿悲觀的色彩，他一再以歷史週期循環論來證明他的見解。史氏認為假如一個「文化」走向「文明」時，就等於由人性的內在發展走向人性最外在、最不自然的狀態，它的必然結果是人類命運劫數的帝國主義。在歷史經驗中，這種現象在第四世紀與十九世紀各發生過一次(註九)。

史氏對工業社會的悲觀看法主要基於四項觀察：(1)都市群眾文明具有好戰與不和平的性質(註一〇)；(2)工業文明是以貪利的經濟做基礎，因此勢必大肆擴張(註十一)；(3)民主政治將因金錢的使用趨於毀滅(註十二)；(4)西方文明在全球的擴張將使強權的敵對變成永無止境，尤其以成立世界帝國為目標，將使戰爭綿延不斷(註十三)。因此，他一再強調有必要注意工業文明的弊病，以免西方國家走向沒落的途徑。

### (II) 近代學說的論點

近代學說對工業社會的發展仍有許多存悲觀的見解，它們對

---

9: Oswald Spengler, op. cit., pp. 24-30.

10: Ibid.

11: Ibid., pp. 401-403.

12: Ibid., pp. 391-393.

13: Ibid., pp. 395-396.

後工業社會的文化更不懷好感。我們不擬一一枚舉，而以生態學派與心理學派為例作一簡介。

通常，生態學派以有機體與環境的關係（*organism-environmental relations*）為研究對象，而人類生態學（*human ecology*）則完全以人類與環境的關係（*man-environment*）為主要探討領域（註十四）。儘管生態學者有不同的論點，但他們對科技所帶來的環境污染，以及人類克服自然所造成的「人類——環境」關係不平衡的現象，都認為將驅使人類走向自取滅亡的途徑，這包括暴力與戰爭。

康門納教授（*Barry Commoner*）在「環境的危機」（*The Closing Circle*）一書中，指出「任何生物，想要在地球上生存，就須『適』於生態領域，否則滅亡。環境危機就是生命與其環境之間良好的『適』的關係已開始毀壞的一種象徵」（註十五）。今天，除了煙霧污染空氣外，有毒的化學品、污水、成堆的垃圾等更破壞人類的生態環境。因此，康氏認為先進國家應放棄軍備競賽、擴張勢力，而與第三世界合作，以更多的經費來拯救生態環境，否則將無法挽救人類的生存環境而趨向滅亡（註十六）

另外，有些生態學者強調工業社會造成人口急速增加，使人

---

14: Willis F. Overton and Hayne W. Resse, "General Models for Man-Environment Relations", Harry McGurk ed., *Ecological Factors in Human Development*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 1977), p. 11.

15: Barry Commoner, 宋尚倫譯：環境的危機，台北，巨流出版社，民國63年，頁6—7。

16: 同上，頁252—254。

類與環境間的平衡遭受破壞，因人口增加需要更多產品，而製造更多的產品就污染更多的水與空氣，並產生更多的廢物，侵佔市郊，根本無法滿足過度膨脹的城市（註十七）。這種看法與法國戰爭學派用以解釋戰爭的起源相當接近。該派創始人柏杜魯（Gaston Bouthoul）便認為社會生命如由生理活動來看，乃是由兩個週期相互交替：累積週期與摧毀週期。當精神性、物質性及人口的累積達到滿盈時，就走入摧毀週期，局部或完全摧毀前一週期過多的精神、物質及人口力量，重返累積週期。摧毀週期是戰爭的時期，而累積週期是和平時期。如果社會的人力累積越多，則其毀滅力可能越劇烈（註十八）。

孫馬克（Philippe Saint Marc）教授在「人類的進步或沒落？」（*Progrès ou déclin de l'homme?*）一書中（註十九），強調不論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所建設的社會都是「唯物社會」（*société matérielle*），這種社會的經濟制度是犧牲一切以增加物質財富為目標，因此人類變成毫無理想的「生產者的消費者」（*un consommateur-producteur*）而已。孫氏特別指出西方社會從18世紀以來，「未來二進步」的價值觀念已在今天完全崩潰，

17: Richard H. Wagner, *Environment and Ma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Inc., 1971).

18: Gaston Bouthoul et René Carrere, *Le défi de la guerre (1740-1974)*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a France, 1976), pp. 76-77.

19: Philippe Saint Marc, *op. cit.*, pp. 32-34.



西方工業文明的存在也因而產生危機（註二十）。只要西方國家繼續盲目的朝毀滅的途徑邁進時，則它們將在一項革命或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大災難中消失。因此，他提倡建立一「人道社會」（société humaniste），排除軍國社會（société de puissance）與唯物社會，而所謂「人道主義」（humanisme）是自由加上生態與精神要求。

至於心理學派的看法，最主要的論點，在於工業社會所創造的文化不能滿足人類的心理需要，尤其在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的心理衝突下，個人心理產生不平衡，因而容易以轉移的方式來維持其平衡，而暴力與對他人的侵犯也就構成各種轉移或補償方式的一種，這種現象如升高為集體現象時，也就走向暴力、革命與戰爭（註二一）。

馬可士（Herbert Marcuse）（註二二）認為高度工業化社會奴役人類，使人們成為「單面人」（one dimensional man），甚至對自己產生疏離感（alienation）。他指出科技越進步越加強對人類的奴役，在整個工業文明的世界中，人對人的控制日

20: Ibid., p. 89.

21: 這種看法主要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提出的，簡介可參 Roger-Gérard Schvartzberger, Sociologie ploutique (Paris: Editions Montchrestien, 1971), pp. 267-268; 參 Marice Duverger, Sociologie polit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8), pp.176-179.

22: Marcuse 的觀點見於三本著作：Eros et civilisation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63); L'homme unidimensionnel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68); Vers la libéralisation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69).

益擴張並越具效力。這種趨勢在進步的過程中，並不被視為是一種意外與過渡性的退步。因此，他認為由於工業社會的發展必然加強對人類的控制及對大自然的支配，也就自然導向集中營、種族屠殺、世界大戰、使用原子彈的途徑（註二三）。

佛洛姆（Erich Fromm）（註二四）認為工業社會是一完全機械化的社會，一切只為大量生產、大幅消費，因而使人們變成毫無感情與思想的機器。不過佛洛姆比較樂觀，他認為可透過一些方法漸進改善工業社會的迫害性、暴力性。

布朗（Norman Brown）強調暴力的形成，除了是因人類不敢面對死亡的問題外，另外就是工業社會無法滿足人類的本能所致。因工業社會是一道學而不適當的社會，侵略性就是反抗這種壓抑人類本能發展的一種現象（註二五）。

簡言之，生態學派與心理學派均對工業社會所造成的生存環境感到悲觀，對工業社會只求物質進步，忽視社會結構與生態環境對人類心理與精神所造成的傷害諸多批判，並認為如不去解決這些問題將使工業文明沒落，遭到暴力與戰爭的洗劫。

### （二）樂觀主義者的觀念

與悲觀論者剛好相反，樂觀論者認為科技進步將使人類走向富裕社會，而達到和諧無爭的安樂社會，世界或至少在工業國家

23: Herbert Marcuse, *Eros et civilisation*, pp. 15-16.

24: 參 Roger-Gérard Schwardzenberg, *op. cit.*, pp. 275-276.

25: Maurice Duverger, *op. cit.*, p. 179.

間將建立永久和平。不過，他們對達到和諧社會的過程有不同的見解。我們將分析孔德、馬克斯與滙合論者的觀點。

### (I) 孔德的樂觀論

孔德對工業社會的主要看法是在於工業社會必然取代舊秩序的軍國社會，戰爭將在先進國家間消失。他特別強調科技進步所帶來的經濟生產力，因此他認為共和國間貿易的拓展，將會為歐洲帶來繁榮與和平的時代，同時歐洲可能出現大共和國，並以此為出發點，將發展為全人類的和平。

其實，孔德的首要觀念在於「軍國精神」與「工業精神」的根本對立。他認為歷史發展必然成直線進行，它是由軍國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在軍國社會中必然是好戰的，而在工業社會中必定是和平的。在人類歷史演進過程中，工業革命發生以前的時期屬於宗教與軍國社會，而工業革命發生以後的時期是工業社會，也是科學實證社會（*société scientifique et positive*）（註二六）。

在軍國社會中之所以會充滿戰爭，主要是透過戰爭可獲得奴隸與財富，而奴隸是使自由的公民可以從事征伐的基本原因（註二七），因為他們承擔勞務，所以在軍國與宗教社會中，一切以

26: Raymond Aron, Les é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 pp. 80-81.

27: Auguste Comte,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t. vi, leçon 56, p. 23, leçon 57, p. 287, reproduit dans Raymond Aron,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et la guerre, pp. 10-11.



協助征伐爲目標，當然也就充滿戰爭，同時一切制度與人際關係均爲此事實所決定。

至於在工業社會內，會有和平的原因，是因孔德強調工業社會六項特徵的前三項，而不着重後三項（註二八）。

就第四項而言，勞資對立的現象，依孔德，是淵源於組織粗劣所致，它僅是暫時性而非永久性。對孔德而言，根本沒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抗存在。

就第五項而言，經濟危機也只是一種偶發與表面的現象，並非體制本身的特質，所以孔德認爲它也僅是暫時性。

就第六項而言，自由主義是病態的過渡時期所產生的，換言之，是由宗教軍國社會演進到工業社會時的一種病態。

孔德認爲在工業社會內，主要中堅分子不再是軍人，而是企業家、資本家、銀行家、工程師與科學家。在這些菁英的眼光中，如何征服自然、增加社會財富才是他們的主要活動，戰爭只有帶來混亂狀態，影響勞務組織，更何況戰爭經常是財富的一大浪費（註二九）。因此，他們的責任既然是在防止浪費增加生產，則不可能置身於戰爭。這是工業社會將是和平的原因之一。

至於從軍國社會演進到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可分爲幾個階段：先是工業爲戰爭服務，再是戰爭爲工業服務，最後則透過工

28: Raymond Aron, Les é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 pp. 88-89.

29: Raymond Aron,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et la guerre, p. 10.

業精神建立永久和平（註三〇）。孔德把前二個階段均視為過渡時期。

事實上，史賓格勒的悲觀論就建立在工業為戰爭服務的觀念上，而馬列帝國主義論就建構在戰爭為工業服務的看法上。可是孔德強調工業精神，他認為「工業團結」（*solidarité industrielle*）如能「超越國界，建立在全球的基礎上」（註三一），將可消滅階級制度、職業世襲制，並將有利於每個人依其能力與性向，選擇適當的職業。孔德對工業的定義乃是採取廣義的看法，他認為凡是規則性與自由性的勞動（*travail régulier et libre*）均屬工業，所以，農業、商業、工廠與信用都包括在工業的界說內（註三二）。由此可知，孔德所指的工業化運動並非由生產力的發展或機器的使用來界定，而是由勞動取代戰爭、自由取代奴隸或農奴做出發點。

可是孔德這項觀點尚不足以說明戰爭在第三階段不會發生的理由，換言之，到底如何才能超越帝國主義的戰爭時期？事實上，在18世紀，歐洲國家為獲取殖民地曾發生這類戰爭，但根據孔德（註三三），殖民帝國已因北美脫離英國的統治而開始崩潰。

30: Auguste Comte,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t. iv, leçon 56, p. 80, 引自 Raymond Aron, ibid., p. 11.

31: Auguste Comte, ibid., p. 71, 引自 Raymond Aron, ibid., p. 12.

32: Ibid.

33: Auguste Comte, ibid., p. 236; 引自 Raymond Aron, ibid., p. 13.

同時此一先例將阻止任何大型戰爭的出現，因殖民地有可能脫離母國而獨立，歐洲各國又何必為無法控制的事實而作戰。

法國大革命後的戰爭及拿破崙帝制的戰爭曾使孔德擔心其理論的正確性，及至拿破崙失敗，使他確信軍國精神與工業精神是背道而馳並相互抵觸的。他認為拿破崙所發動的軍事行動，完全違反當時歐洲的社會結構，並忽視歷史的要求，所以，拿破崙才會失敗（註三四）。另一方面，他又確信今後這類征伐將不可能再出現，因自從革命騷動擴張到全歐後，西方各國政府均致力於維持內部安寧，根本無暇進行「意識形態的戰爭」（*guerres de principes*），故當時的歐洲可說已保障一段安寧的時期（註三五）。在此一時期中，政府與工業社會的菁英分子將可致力於建立正統的和平。

事實上，孔德對工業社會的菁英分子寄望甚殷，因為他把工業社會將帶來和平的看法也建立在他們對精神建設的貢獻上。他認為工業社會的穩定性繫於精神權力所採取的行動，因為由菁英分子所執掌的精神權力規律、監督、轉化社會全體，透過這種社會的轉化，將可消滅工業社會六項特徵的後三項（註三六）。

孔德雖然確信帝國主義的戰爭與意識形態的戰爭將會消失，但他認為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戰爭仍會發生。他對這類戰爭

34: Auguste Comte, *ibid.*, p. 215, 引自 Raymond Aron, *ibid.*, p. 14.

35: Auguste Comte, *ibid.*, p. 237, 引自 Raymond Aron, *ibid.*

36: Raymond Aron, *les é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 p.



毅然加以譴責，因為他強調此一趨勢將造成國家間的相互壓迫。不過，孔德仍抱着絕無僅有的樂觀態度，而堅信「現代社會本質所具有的特性」必不致引發戰爭，同時他反對白種人優於其他有色人種的看法（註三七）。

從上所述，孔德的和平論點並非完全忽視戰爭可能爆發的因素，不過，他之所以持樂觀的看法，主要在於他對歷史演進的觀點，既然軍國社會與工業社會完全不同，當然凡與此思想潮流抵觸的，都會消失掉，所以，他不能接受一個社會有可能因瘋狂而自毀的假設。他的和平論點與日後歐洲的發展不符，但二次大戰後，他的預言似受驗證。

#### (II)馬克斯的「災難樂觀論」

馬克斯與孔德一般，認為社會的演進，正由宗教軍國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同時他也相信科技進步將帶來和平。不過，他與孔德不同之處，是有關工業社會建立和平的過程。而且他所着重的，不在於軍國社會與工業社會的歷史演進過程，乃是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勞資對立現象。經由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存有矛盾的觀察，馬克斯以階級鬥爭來解釋歷史的演進（註三八）。他認為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會創造財富，但也同時製造悲慘的勞工階級（註三九），最後勞工階級將發動革命，推翻資本主義

37: Raymond Aron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et la guerre, p.15.

38: 參 Jean-Jacques Chevallier, Les grands oeuvres politiques -de Machiavel à nos jours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66), pp. 267-268.

39: 參 ibid., pp. 270-276; Raymond Aron Les é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 p. 150.

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在此社會中，歷史演進的原動力——社會階級將完全消滅（註四〇），同時政治權力將萎縮，終於達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和平社會。換言之，馬克斯認為要建立和平的社會，必須先經過一段時期的內戰才能成功，所以，亞隆才稱之為「災難式的樂觀論」。

除此之外，馬克斯主義者經常認為資本主義不但在國內會產生階級鬥爭，同時在國際上，資本主義將發展成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戰爭，所以，惟有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後，在社會主義的世界秩序中才會顯現和平（註四一）。不過，此一看法其實是上述理論的延伸。有關這方面看法的批判將於下面闡釋。

#### （Ⅲ）西方滙合論的觀點

從1950年代末期，西方國家的學者有一相當樂觀的看法，認為資本主義社會體系與社會主義社會體系將因工業發展趨於接近，並達到滙合的境界，為世界或至少在先進工業國家間建立永久和平。

其實，有關滙合論的看法，徐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韋伯（Max Weber）、魏伯連（Thorstein Veblen）、伯恩漢（James Burnham）均已指涉（註四二）。不過，當時人們尚未重視滙合論，直至1950年代，兩種不同社會體系有

40: Raymond Aron, *ibid.*, pp. 150-151.

41: Raymond Aron, 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 (Paris: Calmann-Levy, 1968), pp. 249-257.

42: Charles Zorgbibe,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5), p. 342.



滙合的跡象出現，才由一些經濟、社會與政治學者加以建構與發揮。

一般說來，所有滙合論者都有一共同的信念，即認為持續的工業進步，將迫使政治權力去適應經濟社會結構，同時技術進步所造成的經濟繁榮，將使人們不再堅持意識形態，並產生逐漸「減弱政治化」(dépolarisation)的現象。基於這種看法，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社會體系將趨於滙合。

原則上，滙合論的理論基礎是發展論(developmental approach)與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發展論者認為政治發展與經社發展密切有關，一個落後集權的國家，在開發過程中，將因工業化而逐漸改變其經社結構，並因而直接影響社會體系的「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s)；由於決策中心的多元化，將有利於個人或團體參與決策過程，同時也由於人民生活程度的提高，社會張力的減弱，政治對抗將日益緩和，因而導致政治制度的自由化。通常，西方學者都以蘇聯的發展情況來證明上述論點。此觀點雖從事實獲局部證實，但並非如滙合論那麼樂觀(註四三)。

滙合論的另一基石是米卓尼(David Mitrany)的功能主義

43:有關滙合論的評估，同註5。



(註四四)，米氏認為在兩極異元體系下，和平的建立必須經由具有互惠性質的非政治性方法如經濟、技術、科學合作等，才能奏效。他確信只要各國盡力推動功能合作，日後將因各國利益交相疊構，增進休戚與共的關係，同時也將因功能整合，各國主權將逐步削弱，世界政府的出現及世界和平指日可待。許久以來，這種觀點為學者與政要所接受，歐洲經濟共同體就是擬透過經濟整合達到政治整合。另外，西方國家之所以與東歐國家進行功能合作，就是想要打破它們自給自足的政策，促成東西利益的交相疊構，達成兩種社會體系的滙合。這種論點理論上似乎正確，但執行時將因各種因素而限制其成果（註四五）。

---

44: cf. David Mitrany, A Working Peace System: An Argument for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ed, 4, (London: National Peace Council, 1946);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ctio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September, 1957), pp.644-648; 另有關功能主義的個案研究，參 James P. Sewell, Function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Reginald J. Harrison, Europe in Ques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4).

45: 同註 5。

至於日後趨於相似的社會是那一種社會制度，滙合論者有不同的看法。大致上有二派：(1)混合形式的體制 ( symbiose des systèmnes )、(2)新綜合體制 ( synthèse des systèmes )。

所謂混合體制，是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社會體制互相借用對方的經濟發展技術與社會組織方式，來改善各自體制的弊端，因而產生一種混合形式的社會體制。例如索羅金 ( Pitirim A. Sorokin ) ( 註四六 )，定柏根 ( Jan Tinbergen ) ( 註四七 ) 屬於這類看法的學者。而所謂新綜合體制，是指兩種不同社會體制將轉變成另一種新社會體制，而與原來的兩種社會體制根本不同。例如羅斯陶 ( Walt W. Rostow ) ( 註四八 )、賈布雷斯

46: 參 Charles Zorgbibe, op.cit., p.346.

47: 參 Jan Tinbergen, Convergence of Economic Systems in East and West ( Rotterdam: Netherlands Economic Institute, 1965); Charles Zorgbibe, ibid; pp. 346-347.

48: W. W. Rostow, Les étapes de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trad. par M.J. du Rouret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3), pp. 13-24, 145-161.

( John K. Galbraith ) ( 註四九 )、亞隆 ( Raymond Aron ) ( 註五〇 ) 持這種見解，不過，亞隆採取較保留的態度。

簡言之，滙合論的基本觀念根植於工業進步的決定論以及政治制度必須適應此經濟過程的信念。只要工業不斷發展，兩種不同社會體系的經社結構將日趨相似，且政治制度也將因極權的社會主義政體趨向自由化而相近，日久終將滙合，建立至少是東西集團間的永久和平。

綜觀上述，有關科技進步與戰爭間的理論，無論是19世紀或現代學者均有悲觀與樂觀的看法。我們在此僅先做介紹而未做任何批判，主要因這些理論是本文的探討架構，在以後與事實的驗證中，我們將陸續提出評估。

## 二、廿世紀的戰爭——悲觀論獲得驗證？

孔德預測工業社會的發展將使西方先進國家（英國、德國、

---

49: John K. Galbrai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7), 何欣譯：新工業國家，台北，台灣開明書店，民國61年，頁376—379。

50: Raymond Aron, Dix-huit leçons sur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62), pp. 97-117, 354-378.



義大利、西班牙與法國) 結合成「西方共和國」( République Occidentale )，領導人類建立永久和平( 註五一 )，但事實並非如此。相反的，歐洲却充滿戰爭。所謂西方政府因須鎮壓國內暴動與革命，無力對外進行戰爭的說法，與事實並不符合，反而悲觀的論點與事實比較接近。

在廿世紀上半葉，工業國家間不但因許多因素如意識形態、爭奪霸權、殖民地等發生衝突，而且還發生大戰。同時在廿世紀下半葉，儘管先進國家間似趨向和平共存，但革命戰爭與民族解放戰爭却到處發生，許多先進國家或為當事國、或為幕後當事者，更何況還有第三世界國家間的戰爭。

由此可見工業社會並未如孔德所預測般會消弭戰爭，在此，我們將探討廿世紀上半葉兩次大戰的本質及廿世紀下半葉戰爭的性質，以便瞭解到底是工業社會驅使先進國家走向戰爭，或有其他因素導引它們變成好戰的國家。

#### (一) 兩次世界大戰與工業社會

根據柏杜魯( Gaston Bouthoul ) ( 註五二 )，從 1900 —

51: Raymond Aron,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et la guerre, p.19.

52: Gaston Bouthoul et René Carrère, op.cit., p. 196.

1949 之間，共有 107 個主要衝突 ( *Conflit majeur* ) ( 註五三 ) ，其中有 34 個衝突為國際戰爭，而 63 個衝突為國內戰爭或革命。可是因資料與實際困難的理由，我們無法就每一個衝突作詳細的分析，因此僅就兩次世界大戰作為探討的對象，期能瞭解兩次世界大戰是否因工業社會的發展而爆發。

#### (D) 兩次世界大戰的本質

19 世紀的悲觀論者認為工業社會的發展，終將導致戰爭的發生，而馬列黨徒則宣稱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終將爆發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戰爭。這些預言如由兩次大戰的事實來看似均不幸而言中，但到底此兩次戰爭是否如同他們所預測的，為一「殖民戰爭」 ( *guerre coloniale* ) ？或為「帝國主義戰爭」？或是「意識形態的戰爭」？

#### (A)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性質

許多學者致力於瞭解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性質，因這次大戰的交戰國為數眾多，同時它們也不知為何而戰，故到底它屬於上述戰爭的那一類？我們認為它不屬於其中的任何一種。如由發動攻擊者來看，是一種「霸權戰爭」 ( *guerre d'hégémonie* ) ，但如

53: *Ibid.*, p.63.

所謂主要衝突是符合下列六項條件至少一項的軍事衝突而言：(a) 當事國有二個以上；(b) 衝突地區超過一省或一首都；(c) 軍事衝突持續一年以上；(d) 相當激烈，至少有 1000 人以上死亡，此係 David Singer 所定的主要標準之一；(e) 需在內部引起重大後果 ( 分裂或政權的改變 ) ；(f) 引起國際重大後果 ( 兼併 或獨立，產生或消失一國 ) 。 *ibid.*, p. 39.

從防禦者的角度看，却是為維持權力平衡而戰的「平衡戰爭」（*guerre d'équilibre*）（註五四）。因儘管發動戰爭的國家縱無爭奪霸權的意圖，但它一旦戰勝，必會改變國際體系原來的權力分配形態，而成爲霸權國家，即德國將獨霸歐洲。另外，抵抗德國攻擊的西方國家則是要維持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的現狀，如它們獲勝時，將維持原來的權力平衡。

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曾說：「要理解某一個戰爭，首須明瞭戰爭所由發生的政治上各種力量和條件的關係，以推測其特性與本質（註五五）。」只有在瞭解戰爭的本質及其各種政治與環境要素後，才能制定戰略計劃。可是當 1914 年戰爭爆發時，所有交戰國都未瞭解它們所要進行戰爭的本質，任何一方的參謀人員或部會首長都沒想到會演變成絕對形式，以致勝負決定於交戰雙方資源的豐缺（註五六）。

其實，德國將領們以爲殲滅戰略可使德國迅速獲勝，並推行其意志，豈知 1914 年 9 月馬恩河（La Marne）一役，德國

54: Raymond Aron,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et la guerre*, p.18.

55: 克勞塞維茨，張柏亭譯：戰爭論，第八篇，台北，國防部，民國45年，頁 98。

56: 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軍事準備、戰爭過程等，參 Alfred Vagts, *A History of Militarism—Civilian and Military*, revised ed.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Inc., 1959), pp.228-290.



攻勢被阻，盟軍穩住東西綫，而成膠着狀態。當時按理盟軍該決定它們的政治目標，但英、法、俄却僅以戰爭為目的，以致戰爭就如克氏所說，成為一暴力的極度使用而已。

另外，在整個戰爭過程中，我們將發現不論在德方或盟方，軍人的勢力均壓蓋平民政治家，因此，戰爭就成為毫無政治目標節制的絕對戰爭。華格茲( Alfred Vagts )在「軍國主義史」( A History of Militarism-Civilian and Military )一書中，曾指出在英法兩國，軍人「準獨裁」的情形，使平民政治家毫無發言的餘地，如要以政治領導軍事甚為困難(註五七)，而美國軍方雖有附屬於政治的傳統，但華氏亦指出「戰爭對美國軍官來說，是從政治控制獲得解放的機會」(註五八)。至於德國，盧登道夫( Erich von Ludendorff )為了軍事需要，建立「最高指揮部」( the Supreme Command )，與辛登堡元帥( Maréchal von Hindenburg )幾乎擁有軍政大權，平民政治家根本無權過問，同時有關勝利和平的計劃也由軍人制定(註五九)。華格茲特別強調建立和平絕不能由軍人負責，否則只有再觸發另一次新戰爭(註六〇)。

簡單的說，1914年的戰爭中，由於各國缺少對戰爭本質的認識，並忽略戰爭的目的是在推行政治目標之原則，以致戰爭在

57: Ibid., pp. 238-240.

58: Ibid., p. 239.

59: Ibid., pp. 246-249.

60: Ibid., p. 243.

無政治指引下（註六一）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下，變成巨型的霸權戰爭。

### (B)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性質

1914年的戰爭共動員6500萬人，而有850萬人死亡，但1940年的戰爭共動員9200萬人，死亡人數達3800萬人（註六二）。不過，二次大戰不僅是霸權戰爭，也是意識形態的戰爭。因戰爭的結果，如是軸心國獲勝，德國將獨霸西方，日本稱霸亞洲，除此之外，同盟國與軸心國均揭舉不同的意識形態，藉以鼓舞民心士氣。

在二次大戰中，軍事脫離政治指導的現象較之1914年的戰爭有過之而無不及。幾乎在整個戰爭過程中，盟軍的最高指導原則是「勝利」。羅斯福總統（Franklin Roosevelt）提出「無條件投降」原係一句無心之言，却使戰爭不但遠離政治的指導，且使戰爭持續更久。亞隆認為無條件投降在二次大戰中產生嚴重後果：(1)無條件投降迫使德、日人民誓死抵抗到底，因而提高「勝利」的「代價」；(2)無條件投降影響盟軍在1944年解放歐洲路綫的選擇，因當時如果盟軍由南綫登陸而不由西綫時，也許會

61：富勒將軍也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確因無政治目標——尤其是協約國——以致無法有統一的政策，既無統一的政策就不可能有統一的指揮。同時手段壟斷了目的，由客體變成主體。Major-General J.F.C. Fuller, The Conduct of War, 紐先鍾譯：戰爭指導，台北，軍事譯粹社，民國63年初版，頁130—132。

62：Gaston Bouthoul et René Carrère, op.cit., p.195.

比紅軍早抵德國，戰後情勢可能因而不同；(3)為達到解除敵人武裝的目的，美國混淆永久盟邦與暫時盟邦，全力加強暫時盟邦的蘇聯，終於使其成爲自由世界的威脅者（註六三）。

此外，第一次大戰結束後，西方各國工業發展相當迅速，但因上次大戰的經驗，各國均朝「武裝社會」（society-in-arms）發展。一方面各國盡量增進經濟生產，鼓勵工業發明以維持最高程度的「潛力」，他方面復透過軍事組織、徵兵制、意識形態的教育（如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歷史使命感的教育等），以維持高度備戰狀態，導致各國隨時有可能趨向戰爭。換言之，工業化並未如孔德所預期，使歐洲先進國家的軍國主義精神有所轉化，似乎反而更變本加厲。

至於軍人居於支配地位的情形，在 1918 年以後的西方社會亦如往昔。法西斯主義使德、義軍人居於支配地位，掌有充分的政治決定權，而英法兩國也有軍人佔優勢的現象（註六四）。

總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第一次大戰的本身其實就是根源，因凡爾賽和約根本未建立真正的平衡，英美兩國相繼不過問歐陸事務，由法國單獨維持體系的穩定當然不易，更何況和約

63: Raymond Aron, "De la paix sans victoire", Etudes politiques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72), pp. 446-453; 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 ed. 6, pp. 39-40.

64: Alfred Vagts, op.cit., pp. 410-435.



確實對德不公，德國有甚多理由要求改變現狀。他方面，日本經工業化後，國力日強，再加上軍閥掌權當然趨向擴張。只是1940年的戰爭不但是霸權戰爭，而且也是意識形態的戰爭。

從兩次大戰的性質來看，我們會發現工業社會並未轉化歐洲社會的「軍國精神」為「工業精神」，孔德的預測與忠告都未被接受。其實在19世紀的後25年，西方各國反而以征伐去傳播文明，征服殖民地。根據柏杜魯的選樣，在1875—1900期間共發生17次殖民戰爭（註六五），儘管這段期間的戰爭，歐洲各國不一定為獲取殖民地而發生，但海外殖民地確實是戰利品。他方面，歐洲各國雖受工業文明的浸沐，但也未在單一哲學的引導下，建立統一的帝國。同時在1918—1939之間，工業社會也未更加改善軍國精神，反而各先進國都以工業來加強本國的戰力，並以組織的方法使社會成為武裝的社會，各國軍人都居於支配政治的地位。因此，歷史淵源、軍國主義的精神、工業社會趨於激發人民好戰的本性以及戰爭缺少政治目標的指引等終使1940—1945的戰爭成為巨型戰爭。

## (II) 兩次世界大戰與工業社會的關係

從孔德的理論看，廿世紀上半葉在歐洲會充滿戰爭，主要是西方各國仍以昔日傳統進行互動關係。工業社會沒使它們產生根本的變化，因此才會在軍國主義的指引下，德、日以征伐來爭奪霸權或擬傳播它們的思想。我們下面試以一些學者的觀點來說明

65: Gaston Bouthoul et René Carrere, op. cit., pp.207-209.

爲何工業社會在廿世紀上葉會走入歧途，同時我們也將予以評估。

(A)魏伯連 (Thorstein Veblen) 與熊彼得 (Joseph Schumpeter) 的論點及其評估。

德、日兩國是廿世紀上半葉戰爭的禍首，因此，魏、熊兩氏均由實證主義去解釋它們會走向擴張的原因。他們認爲現代社會如在制度與價值上保有封建或貴族傳統越多時，也就愈傾向戰爭。德、日的工業化是在舊秩序內發展成功，並由一群忠於軍國主義價值的階級所推動，才會趨向擴張（註六六）。

日本自從脫離德川幕府的統治，並由明治天皇進行維新的過程中，除了借重西方的軍事制度 (military system) 外，所需人才均從貴族階級中挑選。這些貴族階級在德川幕府時代未被摧毀，而他們都具有武士道精神，乃使明治維新得以順利推動，日本全盤西化就依賴此一階級的公務員、教授、企業領袖、軍官的貢獻而完成。

不過，日本的西化並非徹底，有些傳統並沒破壞，尤其家庭地位、兒童教育、人際關係的傳統組織、天皇固定管轄權、權力原則與天皇是神的後裔等不在改革範圍內。因此，日本在現代化過程中，保留舊文化與傳統精神。就因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一方

66: Thorstein Veblen, "The opportunity of Japan," Essays in our Changing Order, ed. by L. Ardzrooni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54), pp. 248-266.



面是工業社會，他方面又保有封建時代的傳統（註六七），故一旦保障其獨立並加強其權力後，勢會產生征服的野心。1894年，甲午之戰，日本輕而易舉的戰勝中國，復於1904年擊敗俄國，使它高估國力。同時，因推行鼓勵生育政策，以致人口遽增，農產品不足以保障人民日常所需，因此工業產品的外銷成爲日本的生死問題，凡是妨礙日本工業成品外銷的力量均視爲對日本生存的威脅。

島嶼國家的對外政策，約有四項選擇：中立、閉關自守、向海洋擴張與征服大陸。閉關自守已不可能，而日本又因權力的加強及海外市場的需要，就以征服領土做爲維持國際收支平衡與解決人口的問題的方法。因此，它先選擇征服大陸（侵略中國）的政策，俟美國停止供應日本原料及對中國的侵略受挫，乃朝海洋擴張，最後歸於失敗。

如以孔德的理論去說明時，日本可以說在70年間（1870—1940）歷經歐洲四個世紀的歷史過程。它先以工業建設來加強軍事力量，就如同15、16世紀的歐洲一般。繼以強大軍力執行東亞共榮圈的計劃，正如17、18世紀歐洲各國，熱衷於征服殖民地一樣。1945年戰敗後，日本才超越工業社會與軍國社會的組合，而不再從事征伐。



至於德國與日本雖有類似現象（註六八），但從發展來看還是有差異之處。德國歷經歐洲歷史的各階段，並參與西方知識分子的運動，且有各種階級產生，可說與西方文明並行發展。這點與日本不同。不過，1848年德意志自由民主革命失敗後（註六九），中產階級與自由主義被排出政治舞台，而由軍人與公務員扮演決定性角色。德國的統一是由軍事勝利所完成，而非由國會或人民的熱誠所實現。直至1914年，德國的選舉仍非普選制度，而是三級投票制（註七〇），在政治制度上，是君主立憲，而非議會君主（*monarchie parlementaire*）。整個領導階層的思想與遵循的價值是貴族封建思想，所以，德國自然而然走向擴張的途徑。

魏、熊二氏雖對工業社會留有舊秩序餘毒越多越會走向擴張的看法相同，但他們仍有不同之處。魏氏認為從長期看，工業社會終將摧毀古日本的精神與制度的結構。日本在當年從事擴張，

68: 例如 Reinhard Bendix 曾做一比較研究，全文參 "Preconditions of Development: A Comparison of Japan and German)", R.P. Dore ed., Aspects of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27-68.

69: 有關1848年德國自由民主革命的經過，參王曾才編著：西洋近世史，台北，國立編譯館，民國65年，頁511—517。

70: 同上，頁708。

只是過渡時期（註七一）。熊彼得則比魏伯運更進一步，他認為一個社會如在工業化過程，僅是「局部發展」（*partiel development*）時，則舊傳統將繼續存在，而非暫時性。他指出社會結構、類形與態度一旦形成，便以各種形式與工業社會並存，這也就是各工業國家會有不同的原因（註七二）。

魏熊二氏都避免討論責任問題，而僅觀察舊秩序的軍國精神深刻影響德國，但他們並沒肯定帝國主義的殘存是 1914 戰爭爆發的惟一原因，也沒確認非帝國主義國家的敵對將在本質上是和平的。不過，就歐洲各國而言，當時僅德國被看出具有霸權的野心，一旦它獲勝時，將支配整個歐陸。

然而，假如德國資本主義化的程度比軍國主義高時，是否會無帝國主義的行動？換言之，國際體系內，如一強國由平民政治家所領導，而且工業化完全消滅舊秩序的痕跡，則它是否就不致對外擴張？我們認為並不見得，因即使不管工業化與都市化會使一國趨向於反常與暴力行徑（註七三），其他因素如歷史使命感

71: Thorstein Veblen, *loc. cit.*, pp. 251-255.

72: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ed. 3,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50), pp. 12-13.

73: Kurt Lang, *Military Institutions and the Sociology of War*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72), pp. 142-143.



、國家的光榮、權力的本質、國家利益等都會引起戰爭。

除此之外，1939 的德國與 1941 的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會發生，不能完全以封建階級或舊秩序精神的存在來說明。儘管兩國的軍人掌權，但它們均有一舊領導階級主張尊重自由或和平，因而反對極權政治（註七四）。故以簡單的二分法：舊社會對新社會；帝國或軍國主義對工業社會，無法說明複雜的事實。不論上古羅馬時代或近代歐洲，帝國主義者不可能僅由傳統貴族階級擢拔人才。他方面，受群眾支持的「神格領袖」（*chef charismatique*）在行使權力時，經常會比封建軍國精神更極端。從群眾熱情支持所產生的軍國主義，常更具暴力性，而比傳統貴族階級的軍國主義更為恐怖。

總之，封建軍國主義的存在雖是德、日擴張的因素之一，但就兩次大戰而言，並不能完全以軍國主義與工業社會的理論來解釋，誠如亞隆所指出的（註七五），工業社會內的群眾不見得比軍閥較和平，其實群眾的好戰態度不亞於傳統階級。喜好暴力、盲目崇拜權力如推展到極端時，群眾將驅向革命與戰爭，同時其菁英分子將排擠貴族階級。所以，兩次大戰不能單以魏、熊的觀點來解釋其爆發的理由。

#### (B) 馬克斯主義的觀點及其批判

---

74: Raymond Aron,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et la guerre, p. 29.

75: Ibid., p. 30



基本上，馬列黨徒在解釋工業社會與戰爭間的關係是基於下列的看法：資本主義社會是好戰的，而社會主義社會是和平的（註七六）。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會走向戰爭，主要是它以追求利潤為原則，日後將因缺少資源與市場而趨向帝國主義的擴張，而後由於帝國主義的擴張將造成帝國主義間的戰爭（註七七）。這種論點就被用以解釋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

我們如由理論去探討馬克斯主義者的觀點，將發現上述帝國主義論是不正確的，例如羅森堡（Rosa Luxemburg）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於勞工購買力太低，資本家又無法減少投資，勢必產生週期性的生產過剩，因此為了出售過剩產品，也就須在非資本主義國家尋求市場，終須對外擴張（註七八）。羅氏此種簡單的解釋，不能證明購買力與生產結構的調整必須透過征服來解決，同時縱然需把非資本主義國家納入經濟制度的一環，也不能推斷非剝奪這些國家的主權不可，更何況從事實觀察，資本主義國家彼此之間的貿易額遠超過它們與非資本主義社會間的數

76: Raymond Aron, 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 pp.249-257.

77: 馬列有關帝國主義的看法，參 George Lichtheim, Imperialism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1971), pp. 126-142; Benjamin J. Cohen, The Question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3), pp. 34-72.

78: Benjamin J. Cohen, ibid., p.43; Joseph A. Schumpeter, op. cit., pp.49-51.

額。

不過，如觀察歷史事實，我們將相當容易解釋私有財產制與市場經濟會趨向帝國主義的擴張。固然我們很難證明在19世紀，英國如無印度做為其紡織品的銷售市場時，其經濟制度就無法運作。但事實證明工業化初期，最好還是要有較大的市場，因本國低薪政策將使人民無法有足夠的購買力以消費全部產品。

在理論上，帝國主義的擴張雖非與資本主義體制有必然關係，但在歷史上，二者却密切有關。歷史證明經濟擴張經常連帶政治征服，而政治征服又可帶來許多利益，因此，政治征服也就變成資本主義國家間戰爭的原因，換言之，爭奪海外殖民地、並以政治手段控制補給來源與市場是發生戰爭的原因。

其實，征服殖民地並非帝國主義國家發生衝突的唯一原因。熊彼得為證明他的看法，特別着重資本主義產生前的帝國主義經驗，試圖從歷史經驗中，找出帝國主義產生的原因，結果發現一個國家的社會結構是主要原因（註七九）。另一方面，熊氏也指出托拉斯的角色以及違反誠實競爭原則所帶來的利益並不比政治征服來得少（註八〇）。

無疑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頭一階段，會產生各種爭端，但馬列及其黨徒却超越這些事實，而把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發展的某一階段結合在一起，據以解釋歐洲的戰爭，而認為戰爭的目的在

79: 參 Benjamin J. Cohen, *ibid.*, pp. 72-80.

80: Joseph A. Schumpeter, *op. cit.*, pp. 87-106.



分刮世界獲取勢力範圍。列寧在說明 1914 的戰爭時，便指其為「帝國主義的戰爭」，他說：「這是一種征服、劫掠、聚斂的戰爭，一種分刮世界、分配與重新分配殖民地、勢力範圍、資本、財源等的戰爭」（註八一）。事實上，馬列主義者的理論殊為不確，我們可從下列幾點加以說明。

首先，歐洲從事征服殖民地是在 16—20 世紀之間，換言之，帝國主義早在資本主義發生之前即已存在，而不能籠統的說是資本主義壟斷時期的必然結果。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在「國家間的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一書中指出，與 16—18 世紀比較，19—20 世紀征奪殖民地的情形顯得較不激烈（註八二）。

其次，馬列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向外擴張的目的是為獲取市場，以解決內在危機，如由歷史經驗去查證，我們會發現與事實不符。事實上，所有殖民地都非常貧窮，購買力不強，因此，先進國家間彼此交易所佔的比例，遠超過與殖民地的貿易額，英國是最大的殖民帝國，但它並不依賴與殖民地的貿易，其他國家更不

---

81: N. Lenine, "L'Etat et la Révolution", Jean-Jacques Chevallier, Les grandes oeuvres politiques—de Machiavel à nos jours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66), pp. 333-355.

82: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ed. 5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73), p. 51.



會依賴它們的殖民地。因此所謂「貿易緊隨征服」(Trade follows the Flag)是不正確的。我們可由下列圖表看出殖民帝國與殖民地間的貿易額不如馬列教徒所譴責的，除了英國外，其他

[表一] 主要殖民帝國與殖民地貿易佔全國貿易額的比例

國 家	時 間	進 口(%)	出 口(%)
英 國	1894 — 1903	21.27	30.42
	1904 — 1913	25.71	34.75
法 國	1894 — 1903	9.86	11.20
	1904 — 1913	10.58	12.61
德 國	1894 — 1903	0.10	0.35
	1904 — 1913	0.37	0.62
義 大 利	1894 — 1903	0.04	0.30
	1904 — 1913	0.21	1.55
日 本	1894 — 1903	1.66	2.72
	1904 — 1913	6.85	7.80

資料來源：

Grover Clark, The Balance Sheets of Imperialism:

Facts and Figures on Colon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6), 轉引自 Ben-

jamin J. Cohon, The Question of Imperialism (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3),

p.62.

國家與殖民地的貿易額，佔各該國全國貿易總額的比例非常少，根本不足以證明獲取海外殖民地是為獲取市場。更何況每一先進國也可與敵國殖民地進行貿易，而殖民地亦可自由出售其原料予出價較高的國家。

再者，列寧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必須對外輸出資本以解決過剩的資本，因此需要海外殖民地（註八三），此一觀點如由事實去觀察，也將不能成立。不過從 1870 到 1913 之間，許多歐洲國家確實輸出許多資本，例如英國共投資 25 億英鎊。法國從 1880 以後 30 年間，海外投資共達 450 億法國法郎（值 \$ 86 億 U.S.），德國則共有 280 億馬克（\$ U.S. 67 億），美國在 1914 年時，海外投資共有 25 億美元（註八四）。只不過這些投資的分佈地區並非如馬列主義者所說的，因大部分都前往先進國家，而非殖民地（參表三、表四）。其實，如由動機來看歐洲先進國家的海外投資時，我們會發現法國是把海外投資視為一種外交後盾，英國在尋求更大利潤，而德國則在爭取商務利益。因此，它們不必為資本輸出而去征服殖民地，換言之，它們毋需以征服殖民地的手段來保護資本或保障其輸出。

83: Raymond Aron, 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 p. 275.

84: Benjamin J. Cohen, op. cit., pp. 62-63; Ibid., pp. 263-279.



〔表二〕 1913年英國海外長期投資地理分配表

	地 區	投資比例(%)
大英帝國	加拿大與紐芬蘭	13.7
	澳洲與紐西蘭	11.1
	南 非	9.8
	印 度	10.1
	其 他	2.6
	小 計	47.3
非帝國區	美 國	20.1
	拉丁美洲	20.1
	歐 洲	5.8
	其 他	6.7
	小 計	52.7
總 計		100

資料來源：Herbert Feis, Europe, The World's Banker 1870-1914 (New York: Norton, 1965), 轉引自 Benjamin J. Cohen, op.cit., p. 64.

〔表三〕 1914年法德海外長期投資地理分配表

	地 區	法 國 (%)	德 國 (%)
歐 洲	俄 國	25.1	7.7
	奧匈帝國	4.9	12.8
	土 耳 其	7.3	7.7
	其 他	23.8	25.0
	小 計	61.1	53.2
殖 民 地		8.9	12.8
其 他		30.0	34.0
總 計		100	100

資料來源：Herbert Feis, ibid., 轉引自 Benjamin J. Cohen, ibid., p. 65.



一般而言，19世紀歐洲帝國主義的擴張與資本輸出並無直接關連，從上述二表可看出英國、法國與德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先進地區，而非落後地區。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當年最具侵略性的帝國主義國家並非資本輸出國，反而是資本輸入國，例如義大利、葡萄牙、俄國與日本，過多的資本並不影響它們的行為。

最後，儘管19世紀歐洲向非洲擴張的事實，使人很容易相信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向非洲擴張建立帝國有相當密切關連。可是我們很難找到它們間的必然關係。法國當時人口未過多，工業也未缺少市場，它還有過剩的資本，但並不在海外殖民地投資。德國雖然人口增殖率較高，擴張也較迅速，但它向殖民地的擴張還是較遲的國家，同時威廉時代的政府領導者比較着重海外政治情形，而非銀行家或企業家。他方面，雖然有些特殊例子中，歐洲國家會支持某些銀行、財團或企業的利益，可是如從總體而言，歐洲國家征奪殖民地是歐洲權力平衡的副產品。它是促成歐洲和平的原因之一。就法國來說，軍人、冒險家、探險家、傳教士發現非洲是他們可以一展長才，實現自己理想的地區。另一方面，當時歐洲列強間有不成文的默契，凡是在某一地區獲得勢力的國家，就需准許他國在其他地區獲得補償。所以，德國在歐陸抬頭，也樂得法國向外擴張，故海外擴張對法國來說，一方面是國人抱負獲得滿足的機會，他方面是獲得權力補償的方法。熊彼得、亞隆、摩根索等都認為歐洲帝國主義的擴張與權力的爭奪有關，而非經濟因素（註八五）。

---

85: Benjamin J. Cohen, *ibid.*, pp. 75-80; Raymond Aron, "Impérialisme et colonialisme", *Études politiques*, pp. 495-500; Hans J. Morgenthau, *op. cit.*, pp. 50-54.

無論如何，列寧有關歐洲戰爭起源於殖民帝國主義的看法是不正確的，從歷史經驗觀察，不但無法證明他的論點，而且我們還可發現一些事實：(1)資本主義國家並未因內在矛盾或經濟成長的需要而發生戰爭；(2)所有因殖民地爭執或以殖民地為賭注所引起的外交危機，均以和平方法解決；(3)當巴爾幹半島的衝突激起各國人民的情緒，乃爆發大戰，並使歐洲的均勢發生問題（註八六）。其實，在第一次大戰爆發的前夕，歐洲列強沒必要進行生死之鬥，換言之，就如孔德所說應組成「西方共和國」。不過孔德所說的並非實際的歷史，而是理性的歷史。不幸的是人類的歷史演進經常會受到不理性因素的影響，而無法控制。誠如亞隆所說（註八七），假如未發生無意義或災難的事件，1914年的戰爭似可避免。

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馬列黨徒仍循馬列帝國主義論去說明，史大林在戰後，一再強調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危機所造成的。因為資本主義國家以不同的成長率在發展，它們的權力平衡一直都不穩定，因此，它們彼此間的同盟或協議隨時會破裂。由於各國的經濟成長快慢不同，所以它們經常受到需要改變的壓力，殖民帝國定期重分勢力範圍也就成為解決此一問題的方法。但是新興強權改變現狀的要求必遭受原強權國家的抵制，

86: Raymond Aron,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et la guerre, pp. 36-37.

87: Ibid., p. 37.



帝國主義戰爭當然不可避免（註八八）。這種看法，我們在前面已加以探討，不再贅述。現在我們所要分析的是馬列黨徒有關社會主義社會是和平的，資本主義社會是戰爭的觀點。

馬克斯主義者認為在社會主義體系內，由於廢除私有財產制，並採計劃經濟制度，故社會主義是和平的。他們指出社會主義的工業國家將維持官方的經濟關係，因而不致有帝國主義產生（馬列教徒認為民間財團間的競爭會產生帝國主義的衝突），也就不會發生戰爭（註八九）。這種看法並不正確，因為官方性質的國際經濟關係不會剷除引起爭端的所有因素。

馬克斯主義者認為市場經濟無法保障價格的公平，而有利於先進國家。可是廢除市場經濟代之於政府間的協調也不能保障其公平。南斯拉夫、波蘭均曾抗議蘇聯以低價向它們購買原料（註九〇），而中共更指控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帝國主義國家。其實，儘管市場經濟制度並非完美，但較之國家間的協調更能獲得一較客觀的價格，因為國家談判總是較主觀、較武斷。除此之外，市

88: Stalin, "Election Speech, Feb. 9, 1946", Myron Rush,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Ohio: Charles E. Merrill Publishing Co., 1970), pp.117-119.

89: Raymond Aron, 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 pp.279-280.

90: Ibid., p. 280.



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制度把財產與主權分開，個人得依自己意願選擇自己的顧客，比較具有彈性，同時大家也互相尊重，縱然買賣不成，也不致因與主權混淆而發生戰爭。

然而，社會主義體制就無此種益處。從理論上看，計劃經濟將加強擴大空間的慾望，因在此制度下，企業與個人皆須服從國家的計劃與意願。可是自由國家的商人都以本身的利益與喜好決定商務行爲，一旦不購買社會主義國家的貨物，豈非影響後者的經濟穩定。因此，幅員的廣濶對社會主義國家就變得非常重要。他方面，經濟計劃者不喜歡無法預測的情況發生，爲避免或減少不可預見的情形發生而影響整個體制，兼併或置他國於自己經濟計劃下，豈非變成解決危機的方法？蘇聯在戰後把東歐國家關入鐵幕，並成立經濟互助理事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簡稱COMECON），豈非是一明證？

假設我們承認社會主義會導向和平（其實並非如此），可是資本主義國家間也並未要挽救它們的投資或爲獲得較大利潤而發生戰爭。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取代英國成爲世界第一經濟國家，它們並未發生戰爭，而且是同盟國。我們再假設縱然社會主義真的普遍化，也只有在下述條件下才可能有和平：(1)世界政府的成立；(2)如未成立世界政府，則一方面必須消除強國支配弱國的情況，他方面獨立自主的國家必須以博愛精神取代對抗。

總之，不論任何體系，工業社會都會引起許多衝突，並非能夠以單一理由如魏熊理論、馬列說法就能解釋，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工業社會的許多特性有密切關連，例如武裝的社會（Society-in-arms）、軍事組織、工業發明、徵兵制、社會化等

，再加上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種族主義、歷史使命感等就已使國家的內涵產生好戰的趨向，而國際體系又分裂成許多不同的主權國家，為爭奪權力、為傳播意識形態等均會成為戰爭爆發的原因。不過兩次世界大戰並非如馬列黨徒所指責的是帝國主義的戰爭，不但1914的戰爭非帝國主義向海外擴張的殖民戰爭，而且1940年戰爭中，社會主義的蘇聯更與資本主義的英國、美國合作，對抗法西斯的德義日三國軸心。所以，1914年的戰爭是霸權戰爭，而1940的戰爭則是霸權與意識形態的戰爭。同時，我們也會發現儘管工業社會有許多衝突的機會，但從不會是生死之戰，因為它們的共同利益總是會取代有限或特殊利益，換言之，和平對它們有利。而兩次大戰趨向於絕對形式的理由，除同盟制度的運作、徵兵制的施行、工業社會的特性外，交戰國無政治目標引導戰爭乃是重要原因之一。

### (二)廿世紀下半葉的戰爭

巴泰鄂斯 (Robert L. Butterworth) 所收集的國際衝突資料中 (Managing Interstate Conflict, 1945—1974: Data with Synopses)，合乎他選樣標準的戰後衝突共246件，另在附錄中尚有96件因不符標準而未被列入 (註九一)。另根據柏杜魯的選樣研究，從1945—1974間，共有71件「主要衝突」(

91: Robert Lyle Butterworth, Managing Interstate Conflict 1945-1974: Data with Synopses (Pittsburgh: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79).

註九二)，而且在1955—1974之間，除1964與1966外，每年有1—3個衝突爆發，同時有5—9個衝突並存（註九三）。由此可見廿世紀下半葉仍有許多戰爭爆發。

不過，我們將發現這些戰爭中，除了「反殖民化戰爭」（*guerre de décolonisation*）、意識形態或霸權戰爭迫使一些工業國家捲入戰爭外，根本沒看到工業國家間的直接軍事衝突。儘管兩大集團曾歷經各種危機，但在核子武器的威脅下與工業文明的浸沐下，各先進國均理智的共同處理危機。他方面，戰後許多「反殖民化戰爭」或「民族解放戰爭」，以及「殖民帝國的繼承戰爭」（*guerres de succession d'empires coloniaux*）或「革命戰爭」雖使西方國家捲入戰爭，但大多數都已退出殖民地，甚至自動將政權移交當地人。可是這些西方勢力退出的真空地帶都變成美、蘇爭奪影響力的地區，所以，工業化雖使先進國家理性化，但並未使它們放棄意識形態的對抗、霸權的爭奪。

此外，亞、非與中東地區也充滿國家間的傳統戰爭，同時西方國家的恐怖主義或暴力情形，都似乎顯示工業社會本身促使人們趨向暴力。

我們將先分析核子時代的戰爭形態，再探討這些戰爭與工業社會間的關係。

---

92: Gaston Bouthoul et Rnmé Carrère, *op. cit.*, p. 63.

93: *Ibid.*, p. 61.



## (I)核子時代的戰爭形態

自從人類邁入核子時代後，由於軍隊與平民間關係的改變、核子武器的發明、交通電訊的發達、效力極高的組織方法、國際體系的變遷等，使戰爭形態受到相當的影響。許多學者嘗試加以分類，但均難提出為大家所一致接受的分類標準，我們不擬加入辯論的行列，而僅以使用的武器與目標為標準加以區分：核子戰爭、民族解放戰爭與革命戰爭、傳統戰爭。

### (A)核子戰爭

核子戰爭是國際體系內的政治單位以核熱武器進行戰鬥的戰爭。迄今此類戰爭尚未爆發，僅是可能發生的戰爭。

理論上（註九四），核子戰爭如爆發時可能有二種形態：全面戰爭（general war）與有限核子戰爭（limited nuclear war）。前者係毀滅性的核子世界大戰，後者則是在方法上、武器上、地區上及交戰國數目上盡量加以限制的核子戰爭，這種戰爭可避免東西集團一旦發生衝突時，立即升高為毀滅戰爭。

從1954年到1962年間，歐美國家曾為全面戰爭與有限核

---

94:有關核子戰爭較詳細的討論，參 Herman Kahn, On (The) nuclear War, ed. 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Raymond Aron, 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 Henry Kissinger, 紐先鍾譯：核子兵器與外交政策，台北，正中書局，民國62年；Lucien Poirier, Des stratégies nucléaires (Paris: Hachette, 1977); Robert E. Osgood, Limited Wa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7).

子戰爭的有效性發生大辯論，同時也是構成西方國家核子戰略演變的基礎。有些人認為一旦爆發核子戰爭，必會升高為全面戰爭，不可能僅維持在有限核子戰爭的層面。但另有些人認為不但需準備有限核子戰爭，而且更需有全面戰爭的準備，因如無全面戰爭的恐怖後果來約束政治單位，則不可能會有有限核子戰爭。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與亞隆均持後一觀點。

不過，目前東西兩大集團因嚇阻戰略的成功，已使核子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減少到最低程度。倒是小國擁有少數核子武器觸發有限核子戰爭的可能性將是一大問題。因這些國家很可能是開發中國家，它們的對外行為都較具冒險性與革命性，故彼此間衝突較多，同時它們所擁有的核子武器為數較少、殺傷力較弱，不一定可致對方於死地，因而無法如美蘇間相互嚇阻，進而相互約束。所以，在必要時使用核子武器以挽回頹勢的可能性很大。

我們認為核子擴散、核子武器數量的多寡、賭注的本身、國家發展的程度、領導階層的文化素質、外交政策的本質以及客觀的國際政治情勢等都將決定開發中國家或小國間觸發核子戰爭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似乎與日俱增，值得我們密切注意。

#### （II）民族解放戰爭與革命戰爭（註九五）

這兩種形態的戰爭是以傳統武器進行戰鬥的戰爭，二次大戰後，歐洲殖民帝國或兩超級強國所捲入的戰爭均屬此類形態。

95：有關此兩種戰爭形態的區別，請參蔡政文：核子時代國際關係的特質（體系，和平與戰爭），台北，三民書局，民國67年，增修訂二版，頁129—

民族解放戰爭是受殖民帝國統治或被保護地區的人民中，有一部分人民組成一武裝軍事團體，以游擊與顛覆的方法與殖民政府或保護國進行鬥爭，期能獲取獨立自主的地位。此類戰爭又名「反殖民化戰爭」。從1945年以後，西方殖民帝國受反殖民化熱潮的衝擊，紛紛退出殖民地。目前除了少數地區外（註九六），昔日歐洲列強的殖民地大多成為獨立的新興國家，故由領土的觀點看，「殖民帝國」已成為歷史名詞。

革命戰爭是在一個國家內，有一群少數的人民，運用武力取得對某一部分人民的控制後，從而以暴力與違反法律的手段，達到奪取政權的戰爭形態。這類戰爭經常在殖民地獨立後發生，所以有時稱為「殖民帝國繼承戰爭」。另有些則是在一國之內，出現激進力量，以武力向合法政權挑戰，因而成為內戰。通常美、蘇兩國大多直接或間接介入這類戰爭。

原則上，歐洲殖民帝國退出殖民地後，雖與後者仍維持密切的經濟文化關係，但甚少採取軍事干預行動。同時由於兩極異元體系的特性，這些亞非新興國家雖採不結盟立場，大多受美蘇的影響。

### （Ⅲ）傳統戰爭（註九七）

傳統戰爭是國際體系內，交戰國以傳統武器進行戰鬥的戰爭。它與前述民族解放或革命戰爭不同之處，是交戰的當事者。

96：有關殖民帝國殘存的痕跡，參 Benjamin J. Cohen, *op.cit.*, p.87.

97：有關傳統戰爭的討論，參蔡政文：核子時代國際關係的特質，頁137—142。



它是國家間的戰爭，但後者則是合法權威當局與叛亂團體間的戰爭，是內戰的性質，但常覆蓋一層國際色彩。

二次大戰後的傳統戰爭，除韓戰外，大多是開發中國家間的戰爭，而這些戰爭在兩極異元體系下，交戰雙方除非能迅速決定勝負、或美蘇有一方讓步、或美蘇有意讓它們自己決定外，很少能根本解決問題。主要是美蘇害怕小戰升高或擴大成它們的直接對抗。因此，1945 以後的傳統戰爭是有限戰爭，可分為兩類：(1)軍事目標與政治目標合而為一的戰爭如 1971 的印巴戰爭；(2)軍事目標與政治目標脫節的戰爭如 1956、1967 的以阿戰爭。

### (二) 上述戰爭與工業社會的關係

要探討廿世紀下半葉的戰爭與工業社會間的關係並非容易。如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觀察時，我們有時會發現它們所獲得的結論有很多具有矛盾的現象。例如由計量方法去研究經社發展與暴力的關係時，所獲得的結果與一般政治發展論的觀點不一樣（註九八）。因此，當我們嘗試去解釋兩者間的關係時，是以「可能性」的角度去分析。

### (I) 工業社會與毀滅性的戰爭

孔德預測工業社會將帶來和平的基礎之一，是認為工業國家

---

98: Fred R. von der Mehden, Comparative Political Violence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3), Chapter VI,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pp. 85-109.

將擁有殺傷力不大的武器（註九九），再加上工程師、管理人員、企業家、銀行家的精神當然會使工業社會建立和平。此一觀點在他所處的時代並不算錯誤，因為當時科技發展相當緩慢。不過，從他以後，戰爭鼓勵軍人、工程師、科學家發展國防科技，各國大力開拓資源以製造「破壞性的武器」，以致孔德以後的實際發展與他的觀察不同。而到廿世紀下半葉，這種對武器發明的關心迄未減少，原子彈、氫彈、飛彈、火箭、戰略轟炸機、核子潛艇、巡弋飛彈等，使人類走向毀滅性的戰爭，這是孔德始料所未及者。

在廿世紀上半葉，戰爭的確是工業文明的特徵，但它是初級工業文明所引起的。歐洲工業國家在工業發展的第一階段，人口增多而生產量又超過人口所需，故各國在戰爭所需的人力與物力不虞匱乏。通常各國在戰爭爆發後，交戰的當事者均進行總動員，幾乎各國都把所有力量投入戰爭中，所以後方的農民與勞工對戰爭的貢獻，並不比在前線作戰的軍人較少。兩次世界大戰中各交戰國都希望獲得全面勝利，但並非要毀滅敵人，而是要敵方投降。1918年德國戰敗，使它任憑盟國的處置，而1945年德、日投降却暫時終止德、日的主權，不過都未毀滅它們。

儘管兩次世界大戰由於總動員的運作、追求全面勝利與同盟制度等因素，幾乎達到克勞塞維茨所說的絕對形式，但它們的破壞力與過去的戰爭從相對角度來看是相似的。假如從人力與物力

---

99: Raymond Aron,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et la guerre, p.54.



獲得的難易與武器的破壞性比較，則廿世紀上半葉戰爭的破壞力似應視為不大。在卅年戰爭後，德國的人口減少50%，1914年的戰爭減少德國十年和平所增加的人口。法國與德國在1950年已經超過1939年的人口數量。在1955年，德國的城市業已重建，生產量、生活程度遠超過1939年的程度。西歐各國也在1950年代初期已迅速恢復重建，由此可見工業社會使戰爭所需的人力與物力迅速恢復，相對的使武器的毀滅性不大。

廿世紀上半葉的總體戰，對精神層面的破壞力尤大過物質層面。事實上，兩次世界大戰的基礎是煤碳、鋼鐵、火車、飛機、內燃機的運用，而主要能源是石油，炸藥是化學產品，因此破壞力還相當初級，可是戰爭在經濟上已顯得不太理性。不過，群眾還可被國家與政府所欺騙。尤其工業社會加強了行政權力對人民的控制與影響，透過大眾傳播工具與社會化，老百姓會不知不覺被引入歧途。例如爲了開拓市場應該征服領土、爲了增加財富應該擴張主權等說法，在理智的考慮下應該是荒謬的言論，但對單純的人民來說，他們在體育競賽中如果獲勝，都會感到是全國無限的光榮，並以此爲傲，則一旦在戰爭中獲勝，更不可能毫無反應。所以，工業社會發展的第一階段，給予政府更多加強控制人民的能力，同時也回覆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極權獨裁、奴役人民的要求，這是總體戰對精神層面破壞最大之處。

然而，自1945年以後，我們進入核子時代，完全與1945年以前的科技完全不一樣。現在的炸藥不再是化學成品，而是核子動力的炸藥，同時武器乃是電子武器與飛彈，這些核子武器的毀滅力完全推翻武器破壞力與人力、物力獲取間的關係。一旦發



生核子戰爭，我們無法在幾年內完全恢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工廠的組織並未受到嚴重的破壞，它們在戰爭過程中繼續生產以支援戰鬥。二次大戰期間，交戰國雖遭受敵方的轟炸，但以德國而言，其武器生產到 1945 年仍在增加中，對於住宅區的轟炸並不影響工廠的生產，後來盟國經過慎重的選擇與準確的轟炸才在 1945 年春天，使德國的工業生產癱瘓下來。

今天一旦核子戰爭爆發如係全面戰爭，工業文明將無法避免完全毀滅的境地，而且只要一發動全面戰爭，不再像過去有漸進動員的機會，任何人都無法預測在戰爭初期（幾個小時或幾天之後）過後可能發生的情況。每一個人都知道要一使用毀滅性武器，工業文明就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所以，核子戰爭使戰爭功能中的兩項完全喪失：即賭注或博奕功能與理論宣傳功能（註一〇〇），昔日的戰爭是理性的，合理的，只要政府估計發動戰爭所獲得的利益合算，就可下賭注，透過軍事勝利實現政治目標。另一方面政府亦可透過觀念的宣傳來驗證發動戰爭的合法性，例如透過有限損失可獲較多利益。這兩項功能在過去的戰爭佔有重要地位，但在廿世紀下半葉的核子時代中，核子武器與恐怖平衡使這兩項功能完全無法發揮，因為戰爭需要一段時間才有可能執行其功能，但核子戰爭必在極短時間結束，它的破壞力足以彼此毀滅，甚至毀滅全人類，其結果可能根本就無勝利者而是同歸於盡。縱然有限核子戰爭是可能存在，那麼勝利者不會是交戰國中的任何一方，而是非交戰國。

---

100: Gaston Bouthoul et René Carrère, *op. cit.*, p. 75.

總之，工業文明的發展並未如孔德的預測，透過殺傷力越來越小的武器而走向和平，相反的，科技發展却使人類走入毀滅性的時代，核子時代中任何人都不敢保證世界末日不會隨時降臨。在歷史上，人類與世界的生存第一次繫於我們人類自己的手中。所以副工業社會的發展使人類面臨生死的威脅，但也提供人類和平的希望，這種希望的來臨並非經由孔德預測的過程，而是核子武器副作用所產生的積極作用。我們將在下一部分討論這方面的問題。

### (II) 第三世界的戰爭與工業發展

二次世界大戰後，工業國家彼此之間雖因意識形態與霸權發生對抗，但在核子武器及經社發展的影響下，已不再觸發戰爭。甚至歐洲殖民帝國喪失它們在19與20世紀的殖民地後，並未因市場的缺少而發動戰爭，尤其兩次大戰的禍首德國，雖然失去所有殖民地並遭受分裂的命運，但却反而和平化，日本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它們的舊貴族階級已經消失，可說已由軍國社會渡入孔德的工業社會。今天這兩個國家的人民反對軍備重整最為激烈，昔日帝國主義的中心現在變成工業和平的推動者，這似乎有點合乎孔德的樂觀預測。不過，儘管西方先進國家間不再發生戰爭，可是在第三世界却充滿暴力與戰爭：民族解放戰爭、革命戰爭、傳統戰爭等。而且幾乎在所有開發中國家，軍人在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這與18世紀以後的歐洲有類似的情形。

無論如何，馬克斯或孔德都沒有指出非西方國家走向和平化或社會主義的途徑。在亞洲、非洲、中東出現暴力的原因，一般都認為是傳統結構受西方文明的衝擊所產生的矛盾現象。這就如



同歐洲幾個世紀前，剛工業化時所發生的現象一般。

柏杜魯（註一〇一）認為從 1415 到 1962 之間，尤其是 1740—1974 這段期間，可說是「殖民化—反殖民化」（colonisation - décolonisation）的時期，這段時期的第一階段是歐洲列強征服殖民地的殖民化時期，他認為歐洲會從事於征服的原因，主要是歐洲各國在工業化的初期，由於政治發展仍未達成熟階段、人口又逐漸增加、擁有強力的能源、豐富的資源、科技能力、武器、生理與精神力量等，故形成高壓地區（une zone de haute pression），而世界其他地區，無論在人口、資源開發等，顯得是低壓地區（une zone de basse pression）。這樣一來，就如高氣壓必往低氣壓流動一般，歐洲各國乃向世界其他地區擴張。當時世界權力結構，是以歐洲為中心，座「北南」方向，再東向亞洲與西向美洲擴張。

但是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柏杜魯認為歐洲的高壓現象減弱，而原是低壓的其他亞非地區變成高壓，人類歷史也就走入反殖民化時期。亞非地區經過西方工業文明的衝擊，由於政治發展屬初期階段、人口增多、能源（石油）、原料豐富、生理與精神力量旺盛等，也就造成高壓地區。而歐洲雖然仍受到工業與科技壓力，但與亞非地區比較則屬低壓地區。因此，高壓的亞非地區人民、產品、文化就朝低壓的歐洲湧入，例如第三世界人民往歐洲移民的現象可視為一種證明。

我們雖然不完全贊同柏杜魯的觀點，尤其是有關人口增殖促

---

101: Ibid., pp. 123-124.

使歐洲向外擴張的看法值得斟酌，但他的解釋還是具有局部正確性。事實上，工業發展的第一階段，人口增殖的現象在各國均會發生，歐洲國家窮人生殖率的增高，使馬爾薩斯（T. Malthus）認為社會問題嚴重，必須強制窮人家庭減少生殖，而鼓勵富有家庭的增殖，否則未來的社會將充滿愚笨的人民，同時窮人也將增加搶劫富人財產的慾望（註一〇二）。可是如果探討歐洲人口增殖與科技增加生產量的比例來看，18—19世紀並未達到需要向外擴張的程度，因事實上當時工業生產仍是供過於求的現象。然而對第三世界國家而言，工業發展初期階段却帶來無限的痛苦。首先，由於最初級的衛生設施，使得落後國家的人口自然平衡遭受破壞，生殖率未減甚至升高，但死亡率却降低，也就使人口急速膨脹，面臨嚴重的社會問題。其次，工業化要求落後國家將人力、物力用於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s*），以致農村生產勞力不足，農產品的生產無法供應人民的需要，乃致造成飢荒、乞丐化（*claudardisation*）的現象，社會張力（*social tension*）過大，使政治對抗非常嚴重，政治不穩定是這些國家的特色。再者，由於受到西方工業文明的衝擊，經社結構的變遷，推翻傳統價值系統，而新的價值系統又未形成，因此社會迷亂與暴力也就特多，惟有以強制的軍事獨裁才能維持政治社會的穩定，軍人執政成為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特徵之一。最後，殖民地雖然形式上已經獨立，可是經濟上，文化上仍依賴舊殖民帝國或美蘇，使它們在獨立後，仍秉過去革命的狂熱與民族主義的取向，採取

102: 引自 Maurice Duverger, *Sociologie politique*, p. 68.



對外政策，因此，落後國家不但國內或彼此之間多暴力與衝突，而且在兩極異元體系下，美蘇為爭取影響力也捲入第三世界國家的內戰或它們彼此間的衝突。

亞隆（註一〇三）再指出今天第三世界國家的好戰情形，與當初歐洲工業發展的初期有類似的共同特徵，甚至有關軍人與平民政治家間的關係，第三世界目前的現象與歐洲工業化的初期相似。而在政治方面，歐洲當時是要透過君主立憲來限制王室的權力，要廢除封建貴族階級，要建立平民權力優於軍事權力以及提高法律人員與商人的地位而削弱貴族與軍人的地位。至於在第三世界國家內，則要求先廢除大地主或外國資本家，同時為了使國家能夠穩定建設及維護國家安全，軍人掌權變成常見的現象，但此政權必須使老百姓感到它有能力推動經濟發展與維護國家獨立，才能長期執政，否則革命與政變就不可避免。

儘管近年來有些研究所得到的結論，懷疑經濟發展與暴力間的關係（註一〇四），但我們的觀點仍認為經社發展的程度與暴力還是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事實上，就國內層面而言，貧富懸殊、特權階級、社會流動力不大、種族歧視等經常導致社會動亂，所以惟有縮短貧富差距，普遍提高人民生活程度，廢除特權階級

103: Raymond Aron, "La Mitraillette, le Chard'assaut et l'idée", Etudes Politiques, pp. 511-529.

104: Fred R. von der Mehden, op. cit., pp. 86-90.

，增加社會流動力等才有可能穩定社會。當年西方國家透過福利措施、社會立法才使社會騷亂減少、社會張力減弱，才能施行民主政治。而目前第三世界國家，一方面由於加速發展造成工業發展初期的痛苦情形，他方面又有貧富懸殊、特權階級、社會流動力偏低等現象存在，當然暴力、革命與戰爭也就偏多。這也就是為何第三世界國家常是共產主義的溫床，而列寧也針對此一現象提出他著名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他認為從莫斯科到巴黎的最佳途徑是經由北平、德里（註一〇五）。其實這就是以鄉村包圍城市的延伸，因城市是富有的，而鄉村是貧窮的。另就國際層面來說，幾乎所有先進國家彼此之間不再觸發戰爭。縱然馬列黨徒仍認為資本主義國家間會發生戰爭，但實際上兩次世界大戰雖係歐洲列強間的戰爭，却非帝國主義或殖民戰爭，而 1945 年後，資本主義先進國家間根本沒發生任何軍事衝突，甚至資本主義國家與歐洲社會主義國家間也未發生軍事衝突。這豈非生活程度的提高、社會張力的減弱，導致東西集團沒有必要做生死之鬥所致？反觀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間却經常爆發戰爭。

總之，第三世界國家之所以會充滿暴力與戰爭，與工業社會發展的程度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而國際體系的特性復使暴力與戰爭的現象更為複雜。

經由前述的分析，我們大致上可確定廿世紀的戰爭證實悲觀論者的觀點，但如更深一層的探討，則與工業社會的本質及其他

105: Robert G. Wesson, Why Marx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6), p. 102.



因素有密切關係。同時此種特性並不因經濟社會體制而有不同，馬列黨徒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好戰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和平的，這種說法與事實不符。今天，我們不但看到社會主義國家間有意識形態的衝突，而且也看到它們彼此間有軍事衝突，1969年中共與蘇聯的珍寶島衝突，1979年中共與越南的戰爭豈非是一明證？

### 三、核子時代的和平曙光——樂觀論獲證實

儘管20世下半葉仍有暴力與戰爭，甚至有爆發毀滅性核子戰爭的危險，但大多數的戰爭發生於第三世界，同時全面戰爭也從未發生，其爆發的可能性已減少到最低程度，工業先進國彼此之間却從未有武裝衝突，這種和平化的現象給予人類莫大鼓舞，而工業先進國家間的和平曙光，豈非樂觀論點獲相當事實的支持？不過，東西兩大集團今天和平相處是害怕核子武器的毀滅力，而非如孔德所云破壞性武器的式微所造成。

事實上，人類在核子時代中所生存的和平與昔日完全不同，今天是由於核子武器的毀滅力，迫使人類不得不理智的處理危機、理智的進行對抗，因此所呈現出來的和平是和平中有對抗，對抗中有和平的現象，這是一種「戰鬥型的和平」(paix belliqueuse)。

歐洲和平化的現象確可做為工業社會導致和平的模式，雖然它們和平化過程與孔德的預測不盡相同，但與孔德所提出的「實證時代的和平」無基本上的差異。因不論東歐與西歐，或西歐國家彼此之間，均不再把邊界視為爭論的對象。東西歐自從1975

年8月1日通過歐洲安全暨合作高層會議的議定書後，雙方承認歐洲領土現狀不得以武力變更，除非透過國際法的和平手段。因此，東西兩大集團雖在邊界各佈重兵，但却進行和解，而且有部分東西學者倡導滙合的觀念。

此外，西歐自從1958年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後，法德不但化解世仇，而且領導各國經由經濟統合朝向政治統合邁進。西歐各國內各不同階層原則上均合作無間，社會流動力准許菁英分子獲得上升的機會，職業世襲制已廢除，而特權世襲雖未消失，但已減少很多。同時各國已在1968年實現關稅同盟，打破關稅壁壘，並在農業政策、社會政策、區域化政策方面謀求統一。歐洲貨幣制度（European Currency System）已在1979年建立，並由歐洲貨幣基金來支持歐洲貨幣的穩定。另外，自1975年開始，歐洲委員會已有自己的預算來源，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的議員已在1979年6月經由普選制度選出。故歐洲共同市場的整合現象似趨於驗證孔德的樂觀論。

今天，我們復可發現西歐國家的殖民地大多成為獨立的新興國家，而大多歐洲殖民帝國並未因喪失殖民地，發生馬列所預測的式微現象。相反的，歐洲與日本失去殖民地後，經濟更為繁榮，甚至在面對第三世界集團的要求，也逐漸重視窮國的處境，而在「南北對話」中做某些讓步。

儘管西歐和平化的時間尚短，我們無法做任何結論，但西歐各國在失掉帝國後，却享受前所未有的高度生活水準，人民均參與工作並享受其果實。因此，假如日後不必經由戰爭而能滿足窮



國所需，則又何必觸發戰爭？第三世界趨向暴力、革命與戰爭，只是尚未登入成熟的工業社會所致，總有一天和平似應會到來。下面將先分析核子時代和平的特徵，再探討東西和解與滙合，最後研析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經驗。

#### (一)核子時代和平的特徵

自從 1945 年美國在廣島與長崎投下二顆原子彈後，人類進入一嶄新的時代——核子時代。核子時代迥異於過去，在此一時代中所呈現的和平與傳統和平（註一〇六）不同；它是恐怖和平、僵持和平、共存和平與談判和平。這些和平的特性是基於孔德所未預料到的毀滅性武器所呈現出來的。

#### (I)恐怖和平

國際體系內，各政治單位彼此有能力致對方於死地，並有可能毀滅全人類的情況下，所維持的和平，即為恐怖和平。今天，我們尚未達到這種理想形態的和平，而是由美蘇保證相互摧毀下，所維持的兩極恐怖和平。除了美蘇之外，英國、法國、中共、以色列、印度已成為核子俱樂部（Nuclear Club）的一員。根據美國前總統福特 1976 年 7 月 29 日向國會的報告，到 1985 年，將有 40 國能製造原子彈（註一〇七）。這種核子擴散的狀況，

---

106：我們所說的和平是指「國際體系內，政治單位間，暴力敵對形態呈持續性的中止狀態」，而傳統和平則是依權力關係來區分，有三種：權力平衡的和平；霸權和平；帝國和平。參 Raymond Aron, 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 p. 158.

107：中央日報，民國62年7月31日，版2。

更使世界陷入毀滅的邊緣，而使各國不得不謹慎以避免全面戰爭的爆發。

事實上，美蘇今天所擁有的核子武器，單就核子彈頭而言，美國彈頭數量較多但噸位較小，而蘇聯則數量較少但噸位較大（註一〇八），所以原則上，它們維持一種「恐怖平衡」（balance of terror）。而它們所擁有的核子武器不但可彼此相互摧毀，且可在極短時間內毀滅全人類。在此情況下，美蘇兩國不能不緩和雙方的關係，不能不共同處理危機、壓抑各地衝突，務使國際危機或衝突切勿演變成它們的直接衝突。同時雙方也默示的尊重對方重大利益地帶。其實，美蘇目前主宰世界政治，同時又享有工業文明的高度消費生活，蘇聯在這方面雖無法與美國相比，但它還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正邁入富裕社會。所以它們有無數的理由不必做生死之鬥。但兩極體系的本身就是一種不穩定的體系，要美蘇兩國分治世界不太可能，更何況雙方復有經社制度與意識形態的歧異，故它們必以其他方法在其他地區進行對抗，避免發生直接衝突導致毀滅性的核子戰爭。此外，美

---

108：根據英國倫敦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簡寫 IISS），美國戰略武器（ICBM, SLBM 及長程轟炸機）有 2142 具，彈頭共有 11,000 顆，而蘇聯有 2550 具，彈頭則共有 4500 顆。參 IISS, Military Balance 1978-1979 (London: IISS, 1978), pp. 3-4; 另外如以 1976 年為例時，美國共有彈頭 8530 而蘇聯有 3250，但就噸數而言，則美國只有 1,930 MT，而蘇聯則有 3,755 MT。參 David C. Gompert, Michael Mondelbaum, Richard L. Garwin, John H. Barton, Nuclear Weapons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1977), p. 348.



蘇所領導的兩大集團也盡量避免發生直接對抗，且盡量合理的預防各種可能會觸發全面戰爭的因素介入外交互動過程。

總之，我們今天實際上生活在全面戰爭的邊緣，但也因而迫使工業先進國家必須理智的處理它們的外交決策，甚至有時兩大集團必須暫時拋棄意識形態的對立與同盟的對抗，攜手合作共同解決世界危機。這是孔德與馬列所未能料到的。

## (II) 僵持和平

核子時代的和平也是一種僵持的和平；軍備上是美蘇兩極僵持；思想上是兩極異元僵持；戰況上也是一種難以決定的僵持，在這種和平下，潛伏着無限危機與緊張局勢。

就軍備而言，美國早期曾有過核子絕對優勢，但因缺少傳統兵力，而為蘇聯強大傳統兵力所抵銷，故其實也是在一種僵持的局勢，更何況美國並無摧毀鐵幕的決心。其後蘇聯在核子兵力與海軍力量方面急起直追，趁美國介入越戰無暇也無餘力維持優勢之時，終於在 1972 年美蘇戰略武器限制會談達成第一階段協定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s Talks 簡寫 SALT I) 時，等於讓蘇聯趕上美國與之並駕齊驅 (見表三、四)。就總體而言，美蘇雙方所擁有的軍備不論在攻擊性武器或防禦性武器均呈核子僵局 (Nuclear Stalemate) 的情況 (註一〇九)。事實上，

109：SALT I 協定在攻擊性武器方面，美國洲際飛彈 (ICBM) 數量限制在 1054 顆，潛艇飛彈數量 710 具，可是准許蘇聯有 1618 ICBM，而有 950 潛艇飛彈 (SLBM)。到 1974 年海參崴臨時協定則規定雙方 ICBM、SLBM 及長程轟炸機總數不得超過 2400 具，同時反彈導飛彈的飛彈 (ABM) 不得超過 200 座。

〔表三〕 美蘇洲際飛彈、潛艇飛彈與長途轟炸機數量比較表（1962-1978）

國別	年 代	武 器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美	洲際飛彈 (ICBM)	294	424	834	854	90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潛艇飛彈 (SLBM)	144	224	416	455	592	656	656	656	656	656	656	656	656	656	656	656	656	656
國	長程轟炸機 (Long Range Bonhm)		600	630	630	630	660	545	560	550	505	455	422	437	432	432	432	432	432
	洲際飛彈 (ICBM)	75	100	200	270	300	460	858	1028	1296	1513	1527	1527	1575	1618	1527	1477	1400	1400
蘇	潛艇飛彈 (SLEM)		107	107	107	107	107	121	196	304	448	500	628	720	784	845	909	1015	1015
	長程轟炸機 (Long-Range Bonhm)	190	190	175	160	155	160	155	145	145	145	140	140	140	135	135	135	135	135

備註：長程轟炸機係指6000哩以上

資料來源：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Military Balance 1978-1979, pp. 82-83.



美蘇雙方的軍備僵持是嚇阻策略的基礎，同時也是它們採理智外交行爲的原因。

既然美蘇兵力是處於核子僵局下的恐怖平衡狀態，雙方任何直接衝突皆足以導致世界末日，它們當然小心謹慎，務使各種可能的衝突限制在特定地區、特定方法與武器的使用，以期不致升高或擴大。因此，世界各地戰事，除非美蘇有一方願意讓步，而衝突又能迅速決定外，否則幾乎全部戰爭狀況從長期來看，常是一種僵持的局勢。至於兩大集團各自堅持自己信仰的價值體系與建國原則，更是造成兩極異元體系的原因。

簡言之，由於美蘇的軍備僵持是一種核子僵局，乃造成具有張力與危機的僵持和平。兩超強及兩大集團雖然盡量避免發生直接對抗，但雙方並未排除在必要時仍可不惜一戰的決心。由此而產生的嚇阻戰略使美蘇陷於永久軍備競賽中，這種競賽本質上就隱含戰爭的危機。不過，幸虧高度工業社會發明毀滅性核子武器，再加上內部張力的減弱，使兩大集團及美蘇理性的致力於裁軍。

[表四] 一九七七年美蘇海軍軍力比較表

國別 \ 項目	主要海上 攻擊戰艦	航空母艦	攻擊潛艇
美國	175	13	78
蘇聯	230	1	234

資料來源：I I S S, Military Balance 1977-1978, pp. 6, 9.

### (III) 共存和平

美蘇兩國所領導的兩大集團乃是基於不同社會的對立所形成，由於核子武器的毀滅力，以致雙方不敢輕啟戰端強制已方的意志，以免遭致同歸於盡的命運。因此，雙方在不放棄建立符合本國利益與安全的世界秩序藍圖下，採行和平共存政策避免發生兩大集團的直接衝突，乃使人類生存在共存和平中，不過共存和平並非永久和平，是兩大集團面臨生存的立即威脅所採取的理智行為而形成的。

事實上，美蘇將和平共存都視為一種戰略，對蘇聯來說，和平共存是蘇聯的進步源泉；一方面在 1945 年以前，和平共存使蘇聯獲得一段安寧時間以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而他方面在 1945 以後，除了要保持以前的建設成果外，更進一步要獲得西方國家的經濟與科技合作，俾能改善蘇聯的經濟及增進蘇聯的科技進步。另外，和平共存也是蘇聯用以麻醉西方國家人民對共黨的警覺心，以利共黨的滲透與顛覆，逐步達到赤化世界的目標，所以，和平共存並不放棄思想鬥爭。

至於對美國而言，和平共存剛好配合圍堵政策所訂的目標；消極的圍堵共黨勢力的擴張，並積極的推行帝國外交政策（註

110：所謂帝國外交政策（imperial policy）與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 imperialist 或 imperialistic policy）不一樣，根據 Jerome Slater 的看法，認為有四種不同之處：



一一〇)。同時也擬藉和平共存促進東西功能合作，和平改造東歐鐵幕國家的政治社會體系（註一一一）。因此，和平共存並未停止對抗，文化社會鬥爭仍然存在。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工業精神的確使先進國家的菁英分子瞭解戰爭是得不償失的浪費行徑，正如孔德所指出的，但只是孔德未料到菁英分子雖明知戰爭之無益，却又置身於軍備競賽，而此軍備競賽却成為核子時代各種和平特性的基石。共存和平也是這些菁英份子因認識核子武器的特性，而採取理智外交政策所致。

- 
- (a)帝國政策主要是一種國際結構的功能而非國內體系延伸所致，因世界缺乏一國際機構維持和平及執行其他有關政府不易執行的功能。
  - (b)帝國政策基本上不具經濟性質：它既非由於經濟動機所制定，也非為維護某一經社結構而擬定。帝國政策所關心的是權力，基本上是要完成一些非經濟性目標，例如維持世界秩序。
  - (c)通常帝國權力在制定政策時並無任何支配他國的意圖。所以美國可能扮演帝國角色而無帝國政策，焦點就在於無企圖，無動機。如果美國因扮演帝國角色因而實際上有帝國政策，亦只是權力本身所致。
  - (d)帝國主義政策應予譴責，因它是以侵略他國為目的。但是帝國政策淵源於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它所強調的是責任而非權力的濫用。參 Jerome Slater, "Is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mperialist or imperia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No. 1, vol. 91 (Spring 1976), pp. 63-87.

111：西方集團相信經濟發展將導致政治自由化，而功能合作正可給予西方國家經由經濟、技術合作，暗中改造東歐國家，其實這也是滙合論的基礎

#### IV) 談判和平

在全球體系下，除非美蘇有意讓其獨立解決或兩者之一完全讓步，世界各地的衝突很難產生決定性的結果，而須透過談判解決爭端；在兩極對抗中，西方國家都在教導共黨國家採取消耗戰略，放棄全面勝利的意圖，以便經由談判達到和平之重建；而在第三世界國家間的衝突，美蘇雙方都誘使敵對兩造採取消耗戰略，避免戰爭的擴大。因此，談判和平也就成為核子時代和平的特徵之一。

不過，談判和平並非把衝突兩造的爭端根本解決，它只是把問題暫時擱置而已，敵對雙方都有可能重啟戰端，一切繫於國際局勢、雙方軍刀的恢復速度與美蘇兩國的意志而定。至於有超強直接介入的衝突如韓戰、越戰，談判和平是維護超強尊嚴的最低要求。因為只要超強之一，一旦介入戰爭中，以它是世界數一數二的強國地位，不可能在不求勝利的戰爭下，又灰頭灰臉的退出。美國以不求勝利的戰略干預越戰與韓戰，力求自制，不使用核子武器，不擴大戰場，已充分表現其合理的精神，所以，它不可能在毫無尊嚴下退出，談判和平也就是提供強國保留尊嚴的機會。

然而，我們必須注意的是談判和平常給予自由國家人民一種錯覺，以為經由談判所達成的協議，將至少可建立相當持久的和平。其實，與共黨的交易中，透過談判程序所達到的協定，隨時都有在次日即被撕毀的可能，談判對共黨來說只不過是它達到終極目標辯證過程的一環而已。因此，如果要獲得較持續的和平，就須以實力、決心與警惕作後盾，才有可能使與共黨談判所簽定



的協議發生效力。

概括的說，核子時代所呈現的和平現象（註一一二），是以世界末日可能會降臨為基礎。如從孔德的觀點來看，這並非工業社會應有的發展，不過這種工業發展的消極面，却帶來積極的意義：先進工業國家不敢再以暴力推行自己的意志，它們理智的決定對外政策。除此之外，如果一個國家能像美蘇一般，發展成完整的核子國家，則該國必須具有雄厚的經濟能力及高度的科技發展，換言之，必須是高度工業化的社會，在此社會內，人民生活程度必相當高，社會保障某種程度的自由與公平。雖然此社會尚不致完全像孔德的預測成為和平化的國家，但國家富足使社會張力（social tension）減弱，趨於整合的現象，自然會使國家變成較溫和、較考慮到全民的利益；而核子全面戰爭的爆發將帶來毀滅，使一切努力付諸流水，在此情況下，領導人員當然會較理智、較謹慎的處理對外事務，就如今天美蘇兩國之行爲一般。這種現象豈非與孔德所說工業精神是理性實證精神相似<sup>112</sup>而馬克斯的終極論點，其實也認為會和平化，但他的錯誤就在於他對資本主義必定是戰爭，而社會主義必是和平的論調。我們不但可從上述特徵看出工業社會不論體制都被迫必須和平共存，而且從歷史經驗上看，自由先進國家之間從 1945 以後從未有軍事衝突，甚至美國也從未以武力鎮壓盟國，迫使後者接受領導。反觀社會主義集團却經常看到以暴力強制強國意志的情形。例如 1956 匈牙利

112：有關核子時代和平特徵的詳細分析，參蔡政文：核子時代國際關係的特質（體系、和平、戰爭），增訂二版，頁 33—88。

利事件、1968 捷克自由化事件，蘇聯均出兵鎮壓，並提出「布里茲涅夫主義」（Breznev Doctrine），即所謂有限主權說。而中共與蘇聯更經常有邊界衝突，今年（1979）在亞洲地區更先有棉越戰爭，復有中（共）越戰爭。這些現象豈非證明社會主義並不見得和平？魏森（Robert G. Wesson）更進一步指出戰爭才是馬列主義能夠存在的原因，只要戰爭不復存在（至少無任何戰爭有西方國家介入），則馬列主義將無法存在（註一一三）。至於心理學派的論點，我們不必否認高度工業社會所創造的環境也許不能完全適合人類的需要，縱然社會有暴力存在，但這並不是只有工業社會才存有暴力。在人類歷史經驗中，每一時代都有其不完美處，而暴力的存在似乎並非是一種例外。過去之會有暴力是由於供不應求、貧窮與社會不公平所致，但今天高度工業社會已幾乎解決貧窮問題，却又面臨其他產生暴力的因素，這是人類應加以解決的新問題，不過，從總體來說，至少在 1945 以後，工業國家間尚未因心理因素發動戰爭的例子，其實，基於核子武器毀滅力所造成的和平以及工業社會的實證精神，已使人類趨向小心謹慎的處理國家間的關係。

## （二）東西和解與東西滙合

工業社會的高度發展除了顯現上述和平的特性外，尚有積極的一面值得我們加以分析，那就是兩大集團趨向於和解（*détente*），趨向於全面關係的緩和。這種和解的現象更促進兩種不

113: Robert G. Wesson, *op. cit.*, pp. 228-233.



同體系產生某種程度的滙合跡象，使得西方人民，尤其是西歐國家產生永久和平將會到來的幻覺。不過，儘管永久和平尚無法建立，東西兩大集團的確因工業文明的發展而趨於相似。這豈非孔德預言的事實支持？我們下面將簡單的分析東西和解與東西滙合的現象。

#### (I) 東西和解（註一一四）

戰後國際體系如由權力與意識形態去看是兩極異元體系，這就是說由美國領導西方自由主義國家對抗蘇聯所控制的東歐共產國家。一般稱之為東西對抗。

東西對抗從戰後即已開始，但真正轉為激烈是 1948 年開始，也就是當蘇聯把東歐國家全部關入鐵幕，而美國開始透過「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積極援助西歐國家之重建，但也因而進入所謂冷戰時期。冷戰期間（1948—1953）東西陣營對抗激烈，雙方根本無法溝通，簡直就是聾子對話，無法聽進對方任何言詞。同時雙方也積極備戰，尤其韓戰爆發更促使西歐國家着手軍備重整。這段期間可說是戰後最緊張的時期，各種危機

---

114：détente 原意係緩和之謂，並非「和解」之意。但因國人沿用此譯詞已久，所以筆者也採用它，否則蔣夫人所譯「低盪」一詞較為恰當。假如我們採取 détente 的原意時，則東西對抗是否緩和，應以二個階段作比較。因此，戰後國際關係在總體系上的張弛，似可區分為下列三個階段：(a) 1948—1953，冷戰時期，東西關係緊張；(b) 1953—1963，與前一階段比較，東西關係較為緩和，得視為第一階段的和解；(c) 1963—1972，比上一階段更為緩和，得視為第二階段的和解；(d) 1972—目前，又比上一階段更緩和，得視為第三階段的和解。

都似乎可能挑起全面戰爭，但都幸賴兩大集團的自制始未觸發。

然而，自1953年史大林（J. Staline）去世後，東西關係也就開始緩和。首先，韓戰停火。繼而蘇聯展開「反史大林化」（de-stalinization）運動，不但在蘇聯境內鞭屍史大林，而且把此運動擴及東歐各國，不過1956年匈牙利抗暴遭受鎮壓而結束此運動。然後又與南斯拉夫修好。東西對抗也就因蘇聯採取較溫和的態度而趨於緩和或和解（註一一五），從1953年到1962年可視為東西和解的第一階段，只是這段時間雖因史大林的繼承人黑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一再強調和平共存而使東西關係較前改善，但東西對抗仍相當激烈。甚至在1962年美蘇兩國在古巴飛彈危機中，差點發生難以補救的核子戰爭，如非甘迺迪（John F. Kennedy）政府在危機中，以巧妙合理的方法，一方面使蘇聯瞭解美國的決心，他方面又處處為蘇聯留餘地，再加上黑魯曉夫理智的判斷而決定撤出，否則戰爭如果爆發，我們很難想像其會有何結局。從此，蘇聯盡量避免與美國發生正面直接衝突。

1963年，甘迺迪總統發表「和平的戰略」（The Strategy of Peace）（註一一六）演說後，東西和解掀開新的一頁

115：除了韓戰停火，與南斯拉夫改善關係外，蘇聯並在1954年提議召開歐洲安全會議，同時在中蘇衝突中，黑魯曉夫也譴責中共好戰的態度等。

116: John F. Kennedy, "The Strategy of Peace", Raymond G. O'Connor ed., American Defense Policy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5), pp. 365-369.



。甘迺迪在演講中宣稱美國將以其他手段與蘇聯進行建立和平的具體行動。因此，美國除了在政治方面與蘇聯謀求關係改善與協調外，也與蘇聯進行經濟、科技與文化合作，同時東西集團亦展開貿易談判。不過，東西集團積極推展和解是在1960年代末期。尤其1968年當蘇聯派兵鎮壓捷克自由化運動，遭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抗議，蘇聯為緩和西方國家的情緒，乃採低姿態表示願與西方國家進行各種談判。而在1969年，布蘭德（Willy Brandt）任西德總理，採取「東進政策」（Ostpolitik），接受西德現狀，也願承認歐洲領土現狀，換言之，西德不再堅持它代表全德國，而願承認東德。可是這不代表西德放棄統一全德的希望，只是把原為和解出發點，改變成和解過程的終極目標（註一一七）。西德願承認二次大戰後的領土現狀，正符合蘇聯的要求，所以，雙方即開始談判。

此外，尼克森（Richard Nixon）在1969年1月就任美國總統，一方面由於美國國力因越戰、海外駐軍、海外直接投資等因素日漸衰退，亟需一段安定時間休養生息。他方面必須儘速結束越戰以實現競選諾言，所以希望透過和解與共黨國家——尤其是蘇聯與中共——改善關係，以便要求支援北越的中共與蘇聯能迫使北越政府採取較彈性的政策。為此，尼克森提出「談判代替對抗」的口號，並提出五極說（註一一八）為美國孤立政策或滅

117: Patrick Wajzman, L'illusion de la détent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7), p. 7.

118: 有關五極說的批判，同註（112），頁274—275。

少全球承諾的理論基礎。美國這項態度為積極的和解行動，敞開大門，完全與蘇聯的期望相符合。

既然美國與西德都採和解取向，而蘇聯也表示願朝此方向努力，儘管它含有政治目的，但整個國際關係的客觀環境已呈現和解的氣氛。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 1970 年決定 1970 年代北約盟國的任務之一，是緩和東西緊張的關係，並把 1970 年代視為談「判的時代」(註一一九)。而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 Or-

119: cf. NATO documents: The Future Tasks of the Alliance, annexed to the Final Communiqué issued by the NATO Foreign Ministers following their meeting in Brussels, Belgium, on December 13-14, 1967; Reykjavik Declaration on Mutual Force Reduction, Declaration attached to the Final Communiqué issued by the NATO Foreign Ministe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NATO Defense Program, following their meeting in Reykjavik, Iceland, on June 24-25, 1968; Final Communiqué and Declaration of December 1969, issued by the NATO Foreign Ministers following their meeting in Brussels, Belgium, on December 4-5, 1969; all these documents are reproduced in Timath W. Stanley & Darnell M. Whitt, Detente Diplomacy: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Security in the 1970's (New York: The Dunellen Co., Inc., 1970), pp. 115-126; La défense de l'Alliance 1970-1980, publication du Service de l'Information de l'OTAN, Bruxelles, reproduite dans chronique de politique Etrangère, No. 3, vol. XXIV (mai, 1971), pp. 387-396.



ganization ) 亦採取同一立場 ( 註一二〇 ) 。所謂談判的時代也就從此展開。

就政治方面而言，在個體層面上，最重要的是西德東進政策的推展，因為先由西德與蘇聯在 1970 年 8 月 12 日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 註一二一 ) ，承認戰後領土現狀後，才有其他條約的陸續簽訂以及集體層面和解行動的開展。1970 年 12 月 7 日，西德與波蘭簽訂關係正常化條約 ( 註一二二 ) ，承認波蘭戰後的新疆界，換言之，西德同意波蘭業已兼并的德國領土。1972 年 12 月 21 日，東西德簽約 ( 註一二三 ) ，彼此互相承認為一主權國家以及

120: Warsaw Pact Documents: Budapest Appeal of March 1969, issued by the Party and State leaders of the seven active members of the Warsaw Pact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llowing their summit meeting in Budapest, Hungary, on March 17, 1969; The Prague Communiqué of October 1969, issued by 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seven active members of the Warsaw Pact (Albania excluded) following their consultative meeting held in Prague, Czechoslovakia, on October 30-31, 1969; Moscow Communiqué of December 1969, issued by the Party and State leaders of the seven active members of the Warsaw Pact (Albania excluded) following their summit meeting in Moscow on December 3-4, 1969; all these documents reproduced in Timothy W. Stanley & Darnell M. Whitt, *ibid.*, pp. 149-156.

121: 有關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分析及條約全文，請參 Partick Wajsman, *op. cit.*, pp.97-106, 255-256.

122: 有關德波條約分析及條約全文，參 *ibid.*, pp. 106-114, 257-258.

123: 有關東西德條約的分析及條約全文，參 *ibid.*, pp. 125-130, 268-273.

領土的不可侵犯性，不過條約仍留給全德統一的可能性，同時雙方也同意不互派大使，而派常駐代表以示東西德並非互為外國，東德也不要求波昂給它國際法的承認，只不過，條約中其他條款其實已給東德法律承認（註一二四）。1973年12月，西德復與捷克簽訂關係正常化條約。大致上，西德東進政策為東西和解鋪下相當具體的基礎。其次，美蘇戰略武器限制會談是當蘇聯洲際飛彈數量已趕上美國後，蘇聯才同意與美國談判，這正符合尼克森總統的和解政策。所以，從1969年開始協商，而於1972年5月由尼克森與布里茲涅夫在莫斯科簽訂第一階段協定，此一協定限制雙方洲際飛彈數量。但因美國在數量上過於讓步，乃使國會議員非常擔心，而要求美國行政機構尋回均勢。1973年美蘇迅即展開SALT II的談判，但雙方一方面就數量問題有歧見，他方面就巡弋飛彈（Cruise missile）與逆火式轟炸機（Fire-back Bomber）雙方也有爭執，再加上其他因素，使SALT II難以達成協定。1974年福特總統與布里茲涅夫在海參崴先簽訂臨時協定，限制雙方洲際性投擲系統（包括洲際飛彈、潛艇飛彈及長程轟炸機）不得超過2400具，地下核子試爆不得超過15萬噸重的TNT炸藥，同時ABM發射器總數永久不得超過200座。卡特總統（Jimmy Carter）就職後，致力於與蘇聯談判，而於1979年6月18日在維也納簽訂SALT II協定，目前美國參院正在審議中，儘管有人反對批准該協定，但美國國會終將批准，因有利於和解。



至於集體層面，最先解決的問題是柏林問題，當西德與蘇聯簽約後，西德與西方三國（美、英、法）要求蘇聯同意解決柏林地位問題，以看蘇聯的誠意。而蘇聯則認為必須西德批准德蘇、德波條約後才願解決柏林問題。另一方面，西方三國復表示如蘇聯在柏林問題上表現其誠意，則它們將同意召開蘇聯所要求的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後來經由現實主義的估計，蘇聯於1971年9月3日同意並簽訂四國柏林協定（註一二五），對柏林地位、西德對西柏林的主權、西德與西柏林通道均有規定，原則上，蘇聯做了某種程度的讓步。其次，歐洲安全會議於柏林協定批准後，東西兩大集團始於1972年11月22日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Helsinki）召開預備會議，決定分三個階段舉行會議。1973年7月3日在芬京召開外交部長級會議，旋即於同年9月在日內瓦舉行專家級會議，就領土問題、科技經濟合作問題、文化社會以及人道問題做一詳細研究，終於在1975年7月30日—8月1日召開35國歐洲安全暨合作高層會議，並簽訂議定書。在此會議中，西方國家承認歐洲領土現狀，但不排除經由國際法和平程序所決定的領土變更，此係為德國日後統一鋪路，同時西方國家也給予東歐國家最惠國待遇以及必要的技經合作。而東歐則在文化、社會及人權方面作某種程度的讓步（註一二六）。歐安高層

125: 有關四國柏林協定的分析及全文，參 *ibid.*, pp. 115-125, 259-267.

126: 歐安會議經過與內容分析，參 *ibid.*, pp. 131-141, 274-285.

會議的召開為東西和解帶來高潮，曾使西方人民充滿東西滙合的幻想，我們將在下面分析。最後，東西兩大集團又進行共同平衡裁軍談判（Mutual and Balanced Force Reductions），這是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 1968 年 6 月向蘇聯提出，但無反應，直至 1971 年初，蘇聯才表示可以談談。東西雙方乃於 1973 年 1 月—6 月召開預備會議，而於 1973 年 10 月在維也納正式揭幕。由於雙方對裁減軍隊方法無法妥協，故迄無成果（註一二七）。不過雙方的談判有助於和解的氣氛。

就功能合作而言，東西兩大集團從 1970 年代開始即積極推動。雙方貿易額急速增加，同時西方國家前往東歐國家投資設廠或售予東歐國家科技的數目也日漸增加（註一二八）。大體上，功能合作被用於做為東西和解的工具。1972 年，美國與蘇聯曾簽訂三年售穀協定及貿易貸款協定（註一二九），但因美國參院在 1974 年底通過「貿易改革法案」（Trade Reform Act），強制蘇聯放寬俄境猶太裔人民的移民，導致蘇聯廢除該協定，當

127: 共同平衡裁軍會議的經過，參 *ibid.*, pp. 142-153.

128: Gian Paolo Casadio, Transatlantic Trade--USA--EEC Confrontation in GATT Negotiations, trans. by John Cuthbert--Brown, (Westmead: Saxon House, D.C. Heath Ltd., 1973), p. 142; Charles Levinson, Vodka-Cola (Paris: Editions Stock, 1977), p. 377; 另有關東西技經合作的分析可參 J. Wilczynski, The Multinationals and East-West Relations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6); 蔡政文：現階段和解中的歐洲—論兩種不同社會體系的滙合及歐洲合眾國的建設取向，頁 28—35。

129: 蔡政文：核子時代國際關係的特質，頁 210—212。



時美國甚怕影響東西和解，故旋即與蘇聯在 1975 年 3 月重開談判，而於 10 月簽訂五年長期售穀協定，以緩和雙方的關係。

總之，東西和解的現象似可解釋為局部證實樂觀主義者的觀點。儘管東西和解並非永久和平，同時我們也認為和解是東西雙方的戰略應用，但若探討東西趨向和解的原因不外乎下列幾點：(1)核子全面戰爭的爆發將危及全人類的生存，而對抗的加劇，易於觸發毀滅性的戰爭，此對兩大陣營的生存極為不利，故雙方都盡量避免直接對抗，並默示尊重對方的重大利益地帶，而且在國際政治上，盡量壓抑各地衝突，避免升高或擴大。(2)東歐集團經過戰後卅年的安定建設，因富足而自由化、和平化。戰爭在工業社會菁英的眼光確如孔德所說是不可思議的事，但因國際體系是由一些獨立自主的主權單位所組成，權力如未遭受牽制時必然會擴張至遭遇阻礙為止。所以既然兩超強的權力最大，雙方勢必發生對抗，可是核子武器的毀滅力，再加上內在社會條件的影響，美蘇雙方也就一再強調以非武力競賽的重要性。不過，我們必須指出的是工業文明雖使兩大集團趨向和解，甚至攜手合作，但立即的生存威脅使兩超強及兩大集團趨於理智也有密切關係。史賓格勒的觀點就在於未預測到武器發展的恐怖性以及工業社會因富足而帶來的張力減弱現象。馬列的錯誤則在於其資本主義必發生戰爭的論調。

#### (II)東西滙合（註一三〇）

東西和解的現象，使西方人民——尤其是西歐人民產生兩種

130：有關東西滙合問題的研究與批判，參蔡政文：現階段和解中的歐洲。

不同社會體系朝向滙合的期望。而基於科技發展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社會，由於有共同的工業文明淵源，的確也使兩種不同社會體系達到某一發展程度時，趨向於面臨相同的問題，而必須借用對方的理論來解決內部難題。所以，大部分西方學者都認為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經社結構並非呈現完全對立而毫無補救的狀態，因為它們具有共同文明淵源。今天它們會有差異之處，只存在於一些「技經指數」(technico-economic indications)而已。這些技經指數的差距，遲早將會消失，因為西方國家將逐漸接受計劃經濟與經濟合作，而東歐國家將逐步放寬個人的創意，並採取自由經濟的觀念改善經濟生產體制。最後，兩種不同體制將因雙方人民都享有高度消費生活，而趨於滙合。此外，他們更進一步指出，如想實現滙合必須預先完成兩項條件：(1)東西集團的外交政策必須滙合，(2)東歐集團內部必須自由化。

除了一些西歐國家的內在因素外(註一三一)，從外在因素加以分析時，我們將發現有許多事實支持滙合論者的觀點。而且上述兩項先決條件也似乎已達實現的地步。

首先，東歐國家的政經發展已逐漸符合滙合論基石之一的發展論觀念。大部分東歐國家經過卅年安定建設，由於經社結構的轉變，導致政治制度有限度的自由化，縱然是極權政治模式範本的蘇聯，從史大林去世後也產生自由化現象。只不過東歐附庸國自由化的潮流却遭蘇聯當局的限制與紅軍的控制。1956年的匈牙利

131：例如西歐國家的人民害怕全面戰爭的爆發、無力承擔西歐防衛責任、誤解和解的意義、需要獲得疏解未來經濟危機的市場、歐共主義的發展、擺脫超強支配的意向等。有關這些因素的分析，參同上，頁7—13。



利抗暴事件以及 1968 年捷克自由化運動都遭蘇聯紅軍的鎮壓，使東歐附庸國瞭解透過政治方法根本無法脫離蘇聯的控制，可是東歐國家却以經濟方法來滿足人民的需要，同時在不刺激蘇聯的情況下，盡量自由化。

然而，一般西歐的輿論深信有限度的自由化，將無法滿足東歐與蘇聯人民的文化需求。東歐與蘇聯當局勢須逐漸容忍境內知識分子的人權要求（註一三二），而放寬人民基本自由的尺度。西歐人士特別着重東歐為爭取局部合法性，透過經濟改革所引起的政治自由化趨向。這些趨向使東歐國家與蘇聯在政治、社會體制、觀念上均有顯著的不同。亞隆在所著「為衰退的歐洲辯論」（*Plaidoyer pour une Europe décadente*）一書中指出：「任何人前往東歐旅行皆會發現匈牙利或波蘭的社會氣氛與蘇聯的社會氣氛有微妙的不同。在華沙，一位法國人會覺得如同在西歐一般，他會感到是在一個文化不同但有共同淵源的國家中，可是在莫斯科將無此種感覺」（註一三三）。這種現象從某種角度而言

---

132: cf. Jaures Medvedev, Savants soviétiques et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trad. par Marie-Jo Milcent (Paris: Juilliard, 1973); Jean Meynaud et B. Schroder, Les savants dans la vie internationale (Lansane: auteur, 1962); Andrei D. Sakharov, Progress, Co-existence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 trans. by Th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Inc., 1968).

133: Raymond Aron, Paidoyer pour une Europe décadente (Paris: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1977), p. 233.

，與滙合論的觀點有脗合的現象。

另外，從1960年代開始，東歐與蘇聯的計劃經濟制度無法滿足人民的經濟需要，同時在經濟互助理事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簡稱COMECON）範圍內所制定的分工計劃失敗，使它們不得不採取自由經濟的觀念來改革各自生產制度。例如蘇聯在1964年曾推行「李伯曼」（Liebermann）的改革計劃，引進利潤的觀念於生產決定、採取經濟分權的措施、加強貨幣指示角色等（註一三四）。他方面，東歐及蘇聯都與西方國家進行貿易與技術合作，以便克服困難，皮扎爾（Samuel Pisar）曾說：「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者根本毫無選擇的機會，假如他們不與西方合作，那他們只有接受永遠較低的生活程度與較落後的科技發展（註一三五）」。事實上，從1963年開始，東西貿易數量已逐漸增加，1965—1970期間，東歐集團對西方的貿易額，從18.6%增至25.2%，在同一時期，西方對東歐的貿易額，則由2.7%增為4.5%（註一三六）。同時東西雙方又簽訂許多技術合作的契約，為數相當可觀的西方多國企業（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都到東歐各國設廠〔參表五〕。這些現象正表示滙合論另一基礎——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的正確性。

134: *Ibid.*, pp. 235-236.

135: Samuel Pisar, Les armes de la paix (Paris: Editions Denoël, 1970), p. 43.

136: Gian Paolo Cassadio, *op. cit.*, p. 142.



〔表五〕 西方國家企業與東歐國家合作或設廠的例子

企業名稱	原籍	工業類別	1975 營業額 ( \$ 1000 )	合作的東歐國家							
				保	捷	東	匈	波	羅	蘇聯	南斯拉夫
Exxon	美	石油、石化	44,864,824	×					×	×	
General Motors	美	轎車、卡車、武器	35,724,911				×	×		×	×
Royal Dutch/ Shell	英	石油、石化	32,105,096	×	×	×	×	×	×	×	
Ford Motor	美	轎車、卡車	24,009,100		×		×				×
Mobil Oil	美	石油、石化	20,620,392				×	×	×	×	
British Petroleum	英	石油、石化	17,285,854	×		×	×	×	×	×	
Unilever	英	食物、化學產品	15,015,994		×		×	×	×		×
I.B.M.	美	電腦、辦公機器	14,436,541	×	×	×	×	×	×	×	×
General Electric	美	電子工程	13,399,100		×		×		×	×	×
I.T.T.	美	電訊器材	11,367,647	×	×		×	×	×	×	×
Philips Glailam- pen-Fabrik	荷	電子	16,746,450		×		×	×	×	×	×
Augat Thyssen- Hutt	西德	鋼鐵	8,764,899		×			×		×	×
Hoechst	西德	化學產品	8,462,322	×	×	×	×	×	×	×	×
E.N.I.	美	石化	8,334,432	×	×	×		×	×	×	×
Daimler-Benz	西德	轎車、卡車	8,194,271			×	×	×		×	×
Krupp	西德	鋼鐵工程		×	×	×	×	×	×	×	×
U.S.Steel	美	鍍治、開礦	8,167,269		×		×			×	×
B.A.S.F.	西德	化學產品	8,152,318	×		×	×	×	×	×	×
Renault	法	轎車、卡車	7,831,330		×		×	×	×	×	×
Siemens	西德	電力、電子	7,759,909		×	×	×	×	×	×	×
Volkswagen	西德	汽車	7,680,725		×		×		×		×
Bayer	西德	化學產品	7,223,302	×		×		×	×	×	×
Du Pont	美	化學產品	7,221,500		×	×	×	×		×	
Toyota	日	轎車、卡車	7,194,139	×	×		×				

I.C.I.	英	化學產品	6,884,219			×	×	×	×	×	×
Westinghouse	美	電子	5,862,747		×		×	×			×
Mitsubishi	日	工程	5,693,994	×	×	×	×	×	×	×	
Union Carbide	美	化學產品	5,665,000		×			×		×	
Montedison	義	化學產品	5,417,741	×		×	×	×	×	×	×
British Steel	英	鐵與鋼鐵	5,340,183		×			×	×	×	×
Volvo	瑞典	轎車、機器	3,104,740	×	×	×	×	×	×	×	×
Massey-Ferguson	加	冶鋼、卡車	3,000,000	×	×			×	×	×	×
Fiat	義	轎車、卡車	4,881,600	×	×		×	×	×	×	×
Pepsi-cola	美	飲料、化學	2,321,245	×	×	×	×	×	×	×	×
Coca-Cola	美	飲料、服務	2,872,840		×		×	×	×	×	×
Mitsui	日	商業、化學	3,200,000		×	×		×	×	×	×
Dunlop-Pirelli	英義	橡膠、電綫	3,662,060	×	×	×		×	×	×	×
Ciba-Geigy	瑞士	藥劑、化學	3,448,470	×	×	×	×	×	×	×	×
Control Data	美	電腦	1,218,240	×	×	×	×	×	×	×	×
Brown Boveri	瑞士	冶鋼	2,969,108	×		×	×	×	×	×	×

資料來源： Charles Levinson, Vodka-Cola (Paris: Edisions Stock, 1977), pp. 81-82.



其次，蘇聯外交行爲趨於溫和，同時也接受與西方的和解。從某種角度而言，和解政策是東西滙合先決條件之一：外交政策滙合的初步實現。有關東西和解已在上面探討過，我們不再贅述。無論如何，東西和解將創造相互信任的氣氛，有利於功能合作的推行以便透過利益的交相疊構，相互影響。

最後，自由經濟制度與計劃經濟制度皆有各自的缺陷，也均採用對方的觀念來調整或改善，更何況高度工業化社會確如賈布雷斯所云趨向類似的情形。

總之，工業發展的結果確實會使許多不同社會體系的工業社會具有類似的特徵，同時也將使它們趨於接近。孔德與滙合論的見解並沒錯，只是在兩極異元體系下，東西兩種不同社會體系要滙合的可能性並不大，同時縱然滙合成同質社會，也不見得就保證有永久和平的出現。事實上，發展論雖然指出經社結構的轉變會導致政治制度的自由化，可是它也指出政治制度亦有獨立性，不受經社結構的影響，這也是我們目前所看到蘇聯與東歐的情形。其次，功能合作因蘇聯與東歐國家均限制其最高交易額，而此數額非常的低，僅佔世界貿易額的5%而已。再者，和解並非永久和平的前奏，它是彼此雙方的戰略運用，同時也是避免發生直接對抗的工具。最後，從兩極異元體系來看，美蘇兩國不可能讓自己的盟國和平轉變為類似對方社會體系的國家，因這代表恐怖平衡的絕裂，將導致戰爭。同時設若雙方達成滙合，也不可能建立永久和平，只能使國際體系更具彈性，較易維持體系的穩定而已。

綜觀上述，我們可看出工業社會的發展確實也提供廿世紀下

半葉，兩大集團對抗緩和的基石，雖然尚無法如孔德或滙合論的預測，建立永久和平，但高度工業社會促使因意識形態而對抗的集團，有時拋棄對立而攜手合作。同時兩種不同社會體系趨於接近，有利於國際緩和與和平的維持。孔德認為工業社會的領導者將超越戰爭而致力於和平建設，此看法似受到相當事實的支持。

### (三) 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經驗

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歐國家中，曾是世仇的國家（德、法、義）成爲攜手合作的伙伴，共同朝向歐洲合眾國邁進。這種經驗值得爲世界各國的楷模。固然歐洲共同市場的建立有其客觀因素，但其主觀因素之一的工業文明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我們下面將先說明歐洲共同市場的發展，然後分析危機中的歐洲，到底是否有文明的危機？

### (I) 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發展

戰後次日，歐洲的特徵是式微與分裂。歐洲式微的原因是人類尊嚴與文化受到相當的傷害，這種情形早在戰前已發生，只是到大戰爆發達到頂峯。另外，歐洲有一個大國暫時消失，而歐洲各國除英國可說獲得光榮而悲慘的勝利外，其他國家都曾被征服，整個世界產生不平衡的現象，只有美蘇兩國是真正的勝利者，所有歐洲國家都元氣大傷。

歐洲的分裂現象，首先是兩超強把歐洲分裂爲二個勢力範圍，各自支配一個勢力範圍。其次，把德國分裂爲兩半，使歐洲由中部截而爲二。在這種情況下，如要把歐洲組成一個政治與軍事團體就甚爲困難，因爲沒有德國的歐洲是不可能的。另外，統一的歐洲將影響兩超強的霸權，所以歐洲的統合運動也是兩種體系



下的重大問題。

但是，1948年當蘇聯把捷克轉變成共黨政權時，所有西歐國家受到相當的刺激，可是它們不但在物質上不克自保，而且在士氣上也無抵抗蘇聯擴張的信心，同時西歐防禦聯盟又失敗。因此，美國先在1949年與西歐國家組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保障西歐的安全，給予西歐國家與人民安全感，使他們安心的致力於重建工作。其後，美國為使西歐能獨立對抗共黨威脅，除由馬歇爾計劃協助它們重建外，又使西德成為獨立的國家，成為北約的盟國，並積極鼓勵西歐統合運動。所以，在這種背景下，西歐輿論與政要都鼓吹統合。

然而，儘管大家對歐洲統合的方法有不同的看法（註136），最後西歐六國（法、德、義、荷、比、盧）終於在法國外長舒曼（Robert Schuman）的倡議下，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La Communauté Européenne du Charbon et de l'Acier，簡稱CECA），然後再根據斯巴克委員會（Spaak Commission）所提出的建議案，以功能主義為基礎，在1957年3月25日於羅馬簽訂歐洲經濟共同體與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成立條約。上述三個共同體又於1965年4月8日由六國代表簽訂「合併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a Single Council and a Singl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成立共同機構。1973年1月1日，英國、愛爾蘭、丹麥正式成為歐市的會員。

---

136: Gian Paolo Cassadio, op. cit., p. 142.

歐洲共同市場從 1958 正式成立，西歐六國在歐洲委員會的推動下，逐步朝向關稅同盟邁進，由於它們以漸近方法減低關稅，並積極展開與東歐國家成長率的競賽，充分顯示自由經濟制度在經濟發展方面更具效力，同時在經濟力量的培植上也對美國產生相當的威脅，甚至在 1960 年代一方面由於西歐外匯存底已足夠與美國競爭，他方面東西對抗也趨於緩和，共黨的威脅已不如戰後前幾年那麼明顯，西歐國家也就不願再把它們的利益，無條件的附屬在美國的利益之下。因此，歐洲共同市場國家雖然喪失了過去的殖民地，却在經濟方面更為繁榮，我們可由表六、表七、表八看出歐洲共同市場的經濟力量以及對外貿易的成長。

[表六] 世界出口總值與分配表

年 國 別	1950	1960	1970
美 國	16.7 %	15.9 %	13.7 %
歐洲共同市場	15.4 %	23.1 %	28.6 %
英 國	10.1 %	7.9 %	6.3 %
日 本	1.3 %	3.2 %	6.2 %
其他已開發國家	16.5 %	16.6 %	17.0 %
開發中國家	31.9 %	21.4 %	17.2 %
共產集團	8.1 %	11.9 %	11.0 %
貿易總值(美元)	600 億	1280 億	3100 億

資料來源：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submitted by the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 July, 1971, p.344 轉引自 David H. Blake and Robert S. Walters, The Politics of Global Economic Relation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6), p. 18.



〔表七〕 國際準備金總值與分配表

國 別	年 代	1950	1960	1970
	美 國		49.8 %	31.0 %
英 國		7.1 %	6.1 %	3.1 %
歐洲共同市場		6.1 %	26.3 %	33.0 %
日 本		1.2 %	3.2 %	5.3 %
其他已開發國家		15.8 %	16.4 %	24.0 %
開發中國家		20.0 %	16.1 %	18.7 %
國際準備金總值		490 億	610 億	910 億

資料來源：ibid., p.384;轉引自David H. Blake and Robert S. Walters, ibid., p. 19.

〔表八〕 歐市外貿成長表 1958—1972

(Volume index 1963=100)

進 口		出 口	
1958	61	1958	74
1959	61	1959	71
1960	77	1960	93
1961	82	1961	95
1962	91	1962	96
1963	100	1963	100
1964	107	1964	109
1965	112	1965	121
1966	120	1966	131
1967	121	1967	141
1968	135	1968	160
1969	152	1969	172
1970	184	1970	188
1971	185	1971	202
1972	208	1972	243

資料來源："Facts and Figures", The European Community, November 1974, p. 14; 轉引自Kenneth J. Twitchett, ed., Europe and the World—The External Relations of the Common Market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1976), p.4.

歐洲國家放棄傳統的爭戰後，不但攜手合作，而且朝向歐洲統合邁進。就經濟統合而言，儘管有許多學者、政要批評歐市的不當（註一三七），可是西歐國家在歐市的引導下，逐漸整合並使歐洲繁榮乃是不爭的事實。它們在 1968 年 7 月 1 日解除西歐六國的關稅壁壘（註一三八），並決定在 1980 年完成經濟與貨幣聯盟。在政策方面，歐市也達成統一的農業政策，並求稅法的和諧以及朝向統一的社會政策努力。1975 年開始，歐洲有自己的經費來源。至於經濟與貨幣聯盟雖因 1960 年代末期的貨幣危機與 1973 年的能源危機，導致無法如期實現，但 1978 年 12 月 5 日歐洲共同市場決定成立歐洲貨幣制度，這次決定主要還是西德的讓步。因為西德一向與美國密切合作，同時在傳統假設上，西德認為歐市國家經濟政策的滙合是共同貨幣政策的先決條件。所以在早期，它不以儲存的外匯去支持西德無法影響一國經濟政策的國際收支，並且它絕不因成為歐洲貨幣制度的領導者，而以不穩定的歐洲團結犧牲穩定的德美團結（註一三九）。西德之所

137：有關西歐人士對歐市的批判，參蔡政文：現階段和解中的歐洲，頁 43

138：有關歐洲共同市場的發展，參 John Paxton, The Developing Common Market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6); Petter Coffey, The External 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EEC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e., 1976; Kenneth J. Twitchett ed., Europe and the World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1976).

139: Daniel Biron et Alexandre Faire, "Le Mark souverain", Le Monde diplomatique (Novembre 1978), p. 1, 18.



以會推動歐洲貨幣制度的成立，當然是它重新界定與美國的關係以及認為它將能有效的影響各國經濟政策。總之，曾是世仇的德法兩國在歐洲統合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們不再為領土而鬥爭，它們雖會因國家利益而辯駁，但最後總是在歐洲委員會的安排下，獲得順利的解決。

就政治統合來說，羅馬條約的終極目標是達成歐洲政治統合，經濟統合只是政治統合的基礎。可是由於歐洲各國仍然有疆界存在，想要立刻使它們消除主權的觀念不太可能。因此，歐洲政治統合不如經濟統合來得順利。不過，自從戴高樂總統去世後，他的繼任人龐畢度（Georges Pompidou）採取較彈性的態度，而於1969年在海牙召開的高峯會議中，先同意英國入會，再決定歐市國家應該定期開會，協調對外政策。而事實上，大多數未涉及法國國家基本利益的問題，歐市對外政策經常能達到統一的政策。例如與美國的商務談判，不論是1964年的「甘迺迪回合」（Kennedy Round），1973年的「尼克森回合」（Nixon Round）或稱「東京回合」（Tokyo Round），歐市都以集體代表出席。又如南北會談，1975年12月在巴黎召開的「國際經濟合作會議」、「歐阿會談」（Euro-Arab Dialogue）等均只派一代表團參加協商。歐洲委員會也經常獨自召集其他國家的官方或民間代表團在布魯塞爾總部開會協商，歐市事實上有局部獨立主權。此外，歐洲議會的議員選舉已在今年（1979）6月由會員國公民直接投票選出。

綜上所述，歐洲共同市場的發展情形，正像孔德的看法慢慢實現西方共和國，同時有關工業精神壓蓋軍國精神的看法似乎也

逐漸被證實，而且工業社會將由一些科學家、企業家、技術人員、銀行家、知識分子所領導，似乎也在歐洲委員會的表現顯示出來。馬克斯雖然認為工業社會的發展會趨向由技專人員統治的情況，但他的錯誤就在於不如孔德明朗的指出工業社會必然走向和平化，他被階級鬥爭的教條所矇昧。而列寧認為歐洲合眾國如果是資本主義體制時，或根本不可能成立，或非常反動。他指出歐洲合眾國可視為是一種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條約關係，而此條約只是基於一共同政策，就是摧毀在歐洲的社會主義以保持它的殖民地（註一四〇）。列寧這項看法已被證明完全是錯誤的，因為參與歐洲統合運動的西歐國家，幾乎都已失去所有殖民地，它們彼此間的貿易以及與其他先進國家間的貿易佔世界貿易總額80%以上，同時它們的經濟非常繁榮、人民生活程度為世界前茅、貧富差距縮短、勞工生存條件由社會立法所保障、特權階級大體上已不存在，這些比二次大戰前更佳的生存環境，都是在西歐喪失殖民地之後，可見馬列理論錯誤之處，在於受工業發展初期的見象所侷限，而未看出歷史演進的實際方向。

## （II）式微的歐洲或文明的危機？

當西歐人民逐漸不再注意成長率的意義後，一些學者與菁英分子開始對歐洲展開自我批判，尤其1968年5月巴黎學生暴動以及其他地區的共鳴，使得西歐各國面臨嚴重的危機，而1973年的能源危機又使西歐國家再度面臨整個社會的挑戰。這是一件

140: Bernard Voyenne, *Histoire de l'idée européenne* (Paris: Payot, 1964), p. 165.



不可思議的現象，換言之，西歐面對工業社會的危機。

有人解釋 1968 年的學生抗議行動是一種「文化大革命」，因為工業社會的本身創造一系列無法使人類心理獲得發展的文化，以致學生起來反對工業文明。大致上，西歐知識分子對它們西歐工業社會的批判可分為四類（註一四一）：

第一類認為經濟成果無法排除社會不平等，而所有的社會都同時具有經濟與社會目標，不該僅以提高成長率、國民總生產毛額或國民所得為唯一的目標。在 1960 年代，尤其是 1968 年前後，美國與法國一再披露全國財富的增加，並不能減少各種不同形式的的不平等，特別有關家庭世襲的不平等並不因國家財富的增加而改變。所以，出生在富有家庭的人，可透過不同的細膩方式，而有更多的、更快的上升機會。幾乎在所有國家如比利時、法國、德國等都指出僅以口頭宣稱形式上的平等（*l'égalité formelle*），不足以使它在現實社會中實施。因此，大家都提出「機會平等」的口號。1968 年的學生運動中，一再提到這個問題，而其影響也至大，因為世界各國的政要，在他們的演講中，均會提及。

第二類是認為西方自由社會的組織結構令人產生疏離感。西方自由社會在它們的組織、勞動結構中都有層級（*une hiérarchie*）存在，不論是公營或民營的企業結構都一樣，因此在其內工作的人，由於無參與權而產生疏離感（*alienation*）。

---

141: Raymond Aron, "L'Europe face à la crise des sociétés industrielles" Robert Triffin et al., L'Europe des crises (Bruxelles: Etablissements Emile Bruylant, 1976), pp.85-88

第三類是一個世紀前就已存在的「反工業」哲學（l'anti-industrie）。目前許多人批評經濟成長的成功是一種野蠻的行為，因為它破壞生態環境、污染河流、海洋與空氣、造成犯罪的都市化、麻啡的普遍吸食等等，這派論點充分影響工業社會的管理。

最後一類是認為應該減少成長率的重要性，而注意親切感的重要性（l'aménité）。換句話說，應注意生活品質。

其實上述四類批判雖有局部正確性，但並非足以使歐洲陷入文明的危機，或使歐洲式微。

就機會平等的問題來說，這是極為理想的說法，但它的實現相當困難，只要在自由經濟社會中，生在較富有的家庭，確實比別人有更多與更快的上升機會，這還是假設人生而天賦才智平等的情況。不過各國目前一方面積極的打開社會流動力，他方面又消極的節制家庭財富的累積，如與其他國家比較，或與歐洲過去歷史經驗比較，西歐目前在這方面已創造較優良的條件。同時縱然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也不見得會有機會平等的實際事實，特權官僚階級的子弟總比其他老百姓有較多的機會。此外，我們認為人雖生而天賦才智平等，但毋可諱言的，其實有許多生而不幸是殘廢，智能較低的人，甚至在發育過程中因後天的意外事件或社會環境而產生殘障，心智不健全的人，對這些人來說，機會平等毫無意義，他們需要更多的關心與照顧，不能以給予平等的機會為藉口，任其自生自滅。

其次，就疏離感而言，並非用馬克斯的用詞就表示社會主義社會毫無疏離感存在，事實上，如因勞工不能參與管理即會產生



疏離感，則在資本主義體系或社會主義體系都會發生，因為兩個社會的工業發展均朝向龐大組織發展，自然而然就需有科層制度，以便發揮生產效力。有人主張為解決此疏離感應採社會主義的制度，可是我們在研究歐洲合眾國建設取向問題時（註一四二），早已指出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能解決這項問題，反而因工廠須遵守計劃更無參與決定的權利，蘇聯1964年改革案未成功的理由之一，就是官僚政治的影響所致。另外，為解決勞工疏離感問題，西歐國家都採取勞工與資方共同管理的措施，並使勞工成為股東之一。至於因文化無法滿足人類深刻需要而產生疏離感的說法，並未達到會使國家趨向戰爭或文化沒落的地步。事實上，任何社會都非完美，工業文明在整個人類歷史來看還是相當短的時間，而人類真正走入較富裕的時間也只不過是近六十年的事。工業文明與傳統文化比較當然顯得較不深厚，如果假以時日相信會發展出較適合人性發展的文化。

就反工業哲學的說法，或生態學派的觀點來講，無疑的，有許多說法確令人擔心，可是所幸人們已及早發現這些問題，並謀良策，人口節育早在先進國家施行。而資源浪費問題也因能源危機的教訓，使西方國家瞭解資源並非無限的、而是有限的，應善加利用，不可浪費。不過，在1973年能源危機所帶來的衝擊其實是一種表象，而非實際事實。因為當時歐洲並不缺少能源、也不虞資源匱乏，所以亞薩對羅馬俱樂部（Club de Rome）所提出

的報告：「成長的極限」，諸多批判（註一四三）。認為後者在方法上有很大的錯誤，同時犯了以偏概全的誤謬。因此，生態學派的指證，認為唯物社會將走向戰爭並不一定正確，它具有局部正確性，主要是它低估核子武器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同時工業社會的都市化性質造成許多病態，與物質生活的示範作用有密切關係。如何加強文明的精神層面與改善生活方式確有必要。

最後就生活品質問題來說，工業社會產生都市化，使人們在都市中因互不來往，而缺少人與人間的親切溝通，這的確是事實。但有些人主張以社會主義制度來取代並不正確，因為社會主義的社會也是工業社會，當然會與資本主義的社會產生類似的情形。不過有人評估生活品質是以受教育機會、健康保險、福利設施等為標準，結果西歐國家的生活品質高於東歐國家（見表九）。

[表九] 東歐與西歐各國國民生產毛額與生活品質比較

國別	項目	國民生產毛額(\$U.S.)	生活品質	國別	項目	國民生產毛額(\$U.S.)	生活品質
蘇聯		2760	91	西德		7380	93
東德		4220	93	法國		6550	94
捷克		3840	93	英國		4020	94
匈牙利		2280	91	義大利		3050	92
波蘭		2860	91	荷蘭		6200	96
保加利亞		2310	91	比利時		6780	93
南斯拉夫		1880	84	愛爾蘭		2560	93
羅馬尼亞		1450	90	丹麥		7450	96
				瑞典		8670	97

資料來源： "Socialism: Trials and Errors", *Time* (March 13, 1978) pp. 10-11.

143: Raymond Aron, "L'Europe face à la crise des sociétés industrielles", *op.cit.*, p. 97-99.



可見社會主義社會不見得會優於自由社會。

從上所述，西歐國家所面臨的可能是文明危機，而非式微的歐洲，這種危機起因於西歐人士的自我批判，這有助於西歐工業文明的改善與生存。同時我們必須指出的是目前西歐工業文明並未達到心理學派或生態學派所說的，將趨向戰爭。許多國內個人犯罪的增加，並不足以證明戰爭的必然性。1968年5月事件經過歷史的過程，證明並非革命，而是一種心理發洩（psychodrame）。我們認為工業文明有其缺陷，但今天不可能因其有缺點而會使第三世界國家望而却步，相反的，它們將繼續向工業化進軍。同時西歐國家也不致因生態學派的主張，而會瓦解，它們將繼續朝歐洲統合邁進。

綜觀上述，核子時代的和平跡象，似乎趨向於證明孔德的樂觀看法。在總體系上，由於核子武器的毀滅力，使兩大集團在美蘇的領導下，不得不盡量謹慎小心，避免發生直接對抗，遭致人類的毀滅。可是雙方又未放棄建立符合各自安全與利益的帝國藍圖，所以，我們事實上生活在對抗中有和平、和平中有對抗的情勢，但兩大集團的對抗是以非暴力形態進行。同時，我們也發現東西趨向和解，緩和國際關係，它們由集體層面與個體層面在1970年代開始進行談判，承認戰後領土現狀，並進行裁軍。這種和解的現象使西歐人民誤以為東西兩種不同社會體制有滙合的可能，不過儘管我們曾指出滙合的希望不大，但具有共同工業文明的不同體制社會確有類似的特徵，這些特徵將使它們採取較彈性的行為，有利於和平的維持。在次體系上，西歐國家組成歐洲共同市場及其發展的經驗足為人類的模範，但經驗告訴我們，要

朝區域性類似歐市機構的成立，並不簡單，它要求一定程度的工業化，換言之，各國須達高度工業化的社會。

### 結 論

要分析工業社會與戰爭間的關係，並非一件容易的工作。我們嘗試經由理論與事實的對證，來觀察兩者間的關連。結果發現各理論的預言，在工業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獲得局部證實或被證明不確。悲觀論者的觀點在工業發展的前期獲得明證，而樂觀論者的見解則局部在工業發展的高度階段獲得證實。理論與事實間有時是一致的，有時則是矛盾的，這很難歸罪社會學家或哲學家的錯誤，而是社會現象具有可塑性，並隨時在演進中。

就理論而言，悲觀論者認為工業文明將趨使人類走向戰爭，史賓格勒與尼采都具此觀點，而現代生態學派與心理學派均認為工業文明不但破壞生態生存環境，並使人無法獲得心理與精神發展的環境，以致趨向暴力。樂觀論者則持不同的看法，孔德認為工業精神將取代軍國精神，導致工業社會的和平化，但他認為必須是在工業發展的第三階段。馬克斯的災難樂觀論其實與孔德的看法一樣，認為工業社會終將建立永久和平，不過和平化的過程，他與孔德的見解不同。他認為不論在國內或國際層面，資本主義的工業社會都是不和平的，而且是好戰的，只有經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才会有和平。滙合論者則認為工業社會的發展將使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趨向滙合，建立至少是先進工業國家間的永久和平。

上述理論經由歷史事實觀察，我們發現在 20 世紀上半葉的戰爭證實了悲觀論者的觀點。可是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理由並非魏



伯連或熊彼得的想法、或馬列帝國主義戰爭的說法所能解釋。事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種霸權戰爭，它的爆發與工業社會的特性具有密切關連，再加上同盟體系的運作、徵兵制度的採行、外交的偶發事件等因素促成戰爭的觸發。而1914年的戰爭之所以會變成巨型戰爭，盟軍未界定政治目標致使戰爭或為盲目的武力鬥爭。至於1940年的戰爭是霸權與意識形態的戰爭，它爆發的原因，早在1918的凡爾賽和約已經存在，而工業社會的特性也扮演相當份量的角色。無論如何，兩次世界大戰絕非馬列黨徒所指證的帝國主義戰爭。1914年的戰爭並非為向海外擴張殖民地，而1940年的戰爭，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還與資本主義的英美兩國結成同盟。

至於廿世紀下半葉，核子戰爭具有毀滅全球的能力，因此儘管兩大集團擁有核子武器却不敢輕易使用，全面戰爭迄未爆發。但在第三世界國家反而充滿戰爭與暴力，如由工業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主要是因這些國家正處於工業化的初期，所以在國內產生壓力，再加上革命的狂熱與民族主義的引導，使它們具有好戰的性質，而且在兩極異元體系下，它們常受美蘇的直接或間接干預，使得國內革命或彼此間的戰爭益形複雜。

籠統的說，廿世紀上半葉證實悲觀論的看法，但如深入探討時，則與工業社會的發展程度有密切關係。同時這種發展程度所產生的特性並不因經濟社會體制而有不同。馬列黨徒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好戰，社會主義社會是和平的，根本與事實不符。今天社會主義國家間不但有思想鬥爭，而且有武裝衝突。

廿世紀上半葉雖然證實悲觀論的看法，但核子時代却趨向於

證實樂觀論的局部見解。首先，工業先進國家間並非因破壞性武器的式微而和平化，相反的，是由於高度發展而使先進國家避免對抗，這是出乎孔德意料之外的。其實我們生存在恐怖和平、僵持和平、共存和平與談判和平之中，這與昔日傳統和平完全不同。其次，在兩極異元體系下，一方面由於上述核子武器的毀滅力，他方面再加上東歐極權國家經社結構的轉變，導致政治制度的自由化，反映在對外政策上，乃是較溫和的外交決策，所以東西兩大集團趨向和解。同時也因雙方高度工業發展而趨於接近，使得西歐人士期望東西滙合，建立工業先進國家間的永久和平。儘管我們認為其不可能實現，但高度工業社會的一些共同特徵，使雙方趨於理智，不進行生死之鬥。最後，歐洲共同市場國家拋棄昔日的世仇，共同致力於經濟建設與政治建設，充分顯示孔德西方共和國的主張似乎獲得證實。今天歐市雖面臨工業社會的文明危機，但這並非就在眼前足以使西歐沒落，相反的，文明危機只是一種表象而非實體，西歐人士對西方工業文明的批判有助於改善與維持工業文明。

總之，工業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決定一國趨向於好戰或和平。工業社會有可能因社會化、民族主義、工業發明、歷史使命感趨向戰爭，但它也可使各國理性化，避免生死之鬥，而工業社會的高度發展似可使各國和平化，不過一切仍繫於人類自己的手中，工業化創造有利環境，而由人類決定到底要戰爭或要和平。可是核子時代要求限制戰爭。



## AN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ustrial societies and the war through the verification of theory-fact. It will contribute, therefore, to reveal the relations of both aspec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tep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hich will be useful to the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first part studies different theorie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war. The pessimists such as Spengler, Nietzsche believe that the industrial society tend to militarism. The psychological and ecological schools have the similar point of view with regard to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However, the optimists such as Comte and "theorists of convergence" insist that the industrial societies will eliminate the war and establish the permanent peace. Although Marx had the same idea, he saw the different process to the pacification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He argued that the capitalist society is bellicose and only the socialist society is peaceful. Raymond Aron qualified Marx's idea as "catastrophic optimism".

The second part inquires the phenomenon of wa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two world wars tend to justify the pessimists' arguments. But they are neither imperialist war nor colonial war; the War I is rather an hegemonial war and the War II an hegemonial and ideological war. Besides other causes,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society is also one of the reasons which induce human being to fight in the two world wars. the wars in the nuclear age exist only in the Third world. There are still no any direct

military conflict among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lthough these latter pursue without cease the armament competition.

The final part analyzes the traits of peace in the nuclear age. The apocalyptic nature of thermo-nuclear weapons force human kinds to pursue the policy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detente. Although the East-West confrontation continue to be the nucleus of world politics, the two super-powers respect each other the vital interest zone of other side. Meanwhile, for the reason of same origine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he capitalist and socialist societies become more and more similar. This aspect of convergence implies the moderation of foreign policy of the East Bloc. As regards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it must be the stereo-type of the pacification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Therefore, the tendance of pacification among developed countries seems to justify the optimist vision.

In resume, the different steps of industrialization tends to determinate an industrial society which is bellicose or peaceful. The industrial societies would drive human being to fight each other for the reason of socialization, nationalism, industrial innovation, national glory etc., but it could also incite human being to be reasonable, rational. To fight each other or to stay in peace depends on the decision of mankind themselves. The industrialization creates a favorable material environment which let human being the right of decision. However, man is required to limit the war in the nuclear age.